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性別研究中心

2008兩性角色工作坊

ANNUAL GENDER ROLE WORKSHOP 2008

新移民婦女全面觀

Migrant Women from China

樓瑋群、盧家詠編

二零零八年兩性角色工作坊

新移民婦女全面觀

樓瑋群、盧家詠編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性別研究中心

主辦

新移民婦女全面觀

主 編：樓瑋群、盧家詠

出 版：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性別研究中心

錄音整理：巫淑華、楊理君、盧韻怡、盧家詠

© 香港中文大學2009

目錄

歡迎辭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性別研究中心主任 張妙清教授.....	1
------------------------------------	---

主題演講

民政事務局 常任秘書長 尤曾家麗女士.....	4
-------------------------	---

致送紀念品及嘉賓合照.....	9
-----------------	---

嘉賓發言：「新來港」婦女－個人背境、家庭處境和社會資本

香港中文大學 社會學系副教授 蔡玉萍教授.....	10
---------------------------	----

嘉賓發言：「新移民」婦女訪問經驗

香港中文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導師、《天水圍12師奶》作者 陳惜姿女士.....	20
---	----

嘉賓發言：新來港婦女的歧視、經濟、支援問題

同根社主席 楊媚女士.....	32
-----------------	----

答問環節.....	46
-----------	----

分組討論.....	57
-----------	----

分組討論報告.....	60
-------------	----

新移民婦女全面觀

歡迎辭

張妙清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性別研究中心主任



歡迎各位參加2008年兩性角色工作坊。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於一九八五年創立，是香港首個以性別及婦女問題為研究目的的研究組織。我們成立的目的，是希望提高大眾對性別及婦女研究的認識、支持提倡性別平等及婦女地位的行動，並透過社區聯繫及有關活動，影響有關性別平等及婦女發展的政策及措施。

自1991年開始，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中心舉辦每年一度的工作坊，透過這個平台，讓學者、前線工作者、政策決策者、政府代表、社區及婦女團體可聚集一起來交流討論，以學術理論和具科學根據的研究為基礎，結合實際的前線經驗，共同來關注影響婦女的課題，提出政策建議。

今年的兩性角色工作坊題目為「**新移民婦女全面觀**」。在香港，內地新來港人士被統稱為一個群體－「新移民」，這稱號形成一個定型的印象，假設他們都有著同樣的需要、過同樣的生活、有同樣的經驗，而有關他們的訊息，通常都是以負面為主。若以性別觀點去探討，我們會發現女性與男性的生活及需要其實大有不同，作為新移民婦女，她們的經驗有共通性，但同時也是多元和獨特的。透過是次工作坊，我們希望參加者能更全面探討新移民婦女的生活，了解她們廣泛的經驗。

今天的工作坊，我們很榮幸請到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尤曾家麗女士作為主講嘉賓、工作坊的講者包括《天水圍12師奶》作者陳惜姿女士、同根社主席楊媚女士及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蔡玉萍教授，她們將分享研究心得和實踐經驗。在此，我謹代表性別研究中心向各位講者致以衷心的謝意。

除了論壇外，希望透過各位參加者積極的參與和討論，在分組環節分享新移民婦女經驗、探討婦女自強、發展潛能的心

得、分析新移民家庭的處境、討論社區共融的現況。我希望透過較全面的討論，群策群力，令社會服務和政策能更切合社區共融的目標。

主題演講

尤曾家麗女士
民政事務局 常任秘書長



張妙清教授、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我很高興今天獲邀出席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主辦的「兩性角色工作坊」。

今年工作坊的主題是「新移民婦女全面觀」。以下時間，我希望和大家分享如何協助新移民－特別是新移民中的婦女－融入香港社會。

新來港定居的人士

從內地來港定居的人士，跟所有香港居民一樣，可以享用各種公共服務。然而，他們在不同的適應期所需要的服務，因人而異，重點亦有所不同，主要視乎他們在香港的親戚朋友網絡，以及對香港的熟悉程度。

一般來說，在初來港的階段，新來港人士需要較迫切的支援，包括就業、住屋、教育、語言等。

在適應新環境之後，他們會逐漸融入社區，與其他有需要的香港市民一樣，政府會向他們提供其他各式各樣可持續的公共服務，包括醫療、社會福利等服務。

政府幫助新來港人士融入社群的策略，主要有三方面：

- (1) **及時有效**：有關的政府部門會主動積極地為剛抵港人士提供即時、切合需要的資訊和服務；
- (2) **社會共融**：一視同仁，避免標籤效應，消除社會人士對他們的歧視，協助新來港人士早日融入本港社會；
- (3) **地區為本**：確保最有需要的人士受惠。

透過各種及時有效的援助，我們希望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能夠盡快適應香港的生活，融入社區，成為香港的一份子，無分彼此。這樣可確保善用社會資源，更重要的是表明政府對所有人一視同仁，以及按需要提供各種公共服務的決心。

內地新來港婦女

目前，新來港定居的人士中，約三分之二是婦女，其中百份之六十二左右是年齡屆乎25至44歲的女性。

新來港婦女來到香港，人生路不熟，面對適應的困難，加上生活的擔子，又或者和家人有生活上的種種磨擦，往往會感到很無助。

新來港婦女遇到的困難，主要包括：

- (1) 工作
- (2) 生活環境
- (3) 家庭經濟及
- (4) 語言溝通四方面。

我們希望新來港婦女，能夠自力更生，在社區內建立互助網絡，並在有需要時可以尋求協助和輔導。

針對新來港婦女的特別需要，政府有關部門及社會團體為她們提供了各種服務，包括：

- (1) 協助她們**自力更生**的服務(例如尋找工作、職業技能培訓、語言學習班、就業計劃等)；
- (2) 協助她們**認識社區**：透過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主動接觸內地

新來港定居人士，為他們舉辦服務推廣站、交流會、社區機構參觀等活動；

- (3) 協助她們**建立融洽和諧的家庭，提升社區凝聚力**：包括舉辦各種生活適應計劃，舉辦互助小組、親子生活營、婦女適應學習小組、情緒支援及心理輔導服務等；
- (4) 協助她們**照顧子女**，例如提供託兒服務、入學協助、兒童個人成長及適應課程等；
- (5) 協助她們**免受身體、心理或性虐待等家庭暴力**：包括檢討《家庭暴力條例》，加強預防家暴及保護受害人；以及
- (6) 協助她們滿足其他的基本需要，包括提供住屋、醫療等服務。

不同的政府部門、社區團體和志願機構，均努力不懈地協助新來港的家庭和人士。

以民政事務局及民政事務總署為例，我們透過積極**推動社會企業**，例如「**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發掘地區內的新來港定居人士，包括婦女的專長，協助成立提供家常菜、託兒、陪診及家居維修等的社會企業，鼓勵她們自力更生，**融入並回饋社區、互學互助、建立關懷文化**，一同組織社區大家庭。

我想和大家分享兩個獲民政事務總署「**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資助，從而成功協助新來港婦女融入社區及自力更生的成功例子。

(一)「**有機空間**」有機食用菌培植及銷售計劃：

該計劃於2007年12月展開，聘用弱勢社群及失業婦女，在溫室內培植有機菇，並以實習形式擔任展銷工作。由於婦女需要照顧家庭的緣故，往往難以找到全職工作，這個計劃就是要給予

她們彈性，讓她們可以內外兼顧。

(二)「綠家居」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

該計劃自2007年3月於屯門區展開，經營與綠色生活相關的食品及用品業務。

綠家居作為一個社會企業，透過有機食品送遞服務、環保家居及辦公室清潔服務、環保清潔用品(回收煮食油循環再造的梘液和肥皂)生產和銷售等渠道，為屯門區的弱勢社群創造就業機會。其中大部份受惠者是中年失業婦女和新移民婦女，她們在主流勞動市場中往往缺乏競爭能力，但在綠家居開創的就業平台上，得以重新確認自己的潛能。加上「綠家居」提供的工種絕大部份有彈性工作時間，更可為需要照顧子女的婦女提供較理想的生活空間和安排。

「凝聚家庭力量、團結社會動力」是我們幫助新來港婦女的主要目標。要達到這個目標，除了政府的努力，亦有賴在座每一位的支持，希望每一位市民都會常常反思一下，我們可有為家中或鄰居的新來港婦女設想？如果沒有的話，請由今日開始伸出援手。

中國人有句老話：「婦女能頂半邊天」。在兩性關係中，大多數婦女天生均有較大的韌力、持久力和忍耐力，因此她們往往成為家人及子女的精神支柱，新來港婦女亦不例外。

多謝大家。

致送紀念品及嘉賓合照



左起：樓瑋群教授、蔡玉萍教授、張妙清教授、尤曾家麗女士、楊媚女士、陳惜姿女士、王丹凝博士

嘉賓發言

「新來港」婦女 - 個人背境、家庭處境和社會資本

蔡玉萍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社會學系副教授



新來港婦女常被稱為「新移民」婦女，提到這個名稱，我們不免擔心會有標籤效應，在開始計劃今天的講題時，我就思考怎樣才能避免標籤效應？如果我們覺得「新來港」婦女的問題及她們的處境是一個本質論的問題，即是認為這是她們個人或與生俱來的問題，是不可以改變、不應該改變及不能改變的，以這種角度講「新移民」婦女面對的問題就會有標籤效應。要避免標籤效應，就應避免本質論的分析，而從結構層面去看問題。

今天我會分享一些體現結構性層面的問題，從宏觀角度了解「新移民」婦女是一群怎樣的婦女，她們在家庭及社區內的處境是怎樣？這一群婦女如何面對自己的困難、挑戰和如何去改善及克服這些困難？關於這些問題，我想陳惜姿稍後會有更多的分享。

香港基本上是一個移民社會，大部份香港人，或是他們的上一代都是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但為甚麼由八十年代開始到現在，我們會有「新移民」這個名稱？這與香港本土的社會變化有關。我也是在1979年隨媽媽由中國大陸移民到香港，當年香港無線電視正在播放劇集「網中人」，當中有一個角色叫「阿燦」，當年我只是一個七歲的小女孩，卻被人家改別名叫「燦妹」，當時我很不明白地問婆婆：「你來香港的時候(五十年代)有沒有被人叫『阿燦』？」，婆婆說沒有。為甚麼五十年代的移民沒有被標籤，但七十年代末的移民卻被標籤？「新移民」這個名稱是怎樣產生？當你翻看一些對於香港早期社會，例如四、五十年代的描述，會發現其實香港的本土人很少，當時來自中國不同地方的移民自覺大家處境相若，同坐一條船，可以同舟共濟，先在香港安頓的移民對新來的移民少有排斥。但到後來當香港社會開始富庶的時候，尤其是在七十年代後，就開始分「我們」及「他們」。新來港人士就在那時候開始被稱為「新移民」，其實那是一個名稱、稱謂，用以將他們與「我們」區分，將他們變成一個「他者」。

從大眾傳媒的描述亦可見到，除了「網中人」外，很多電影亦對所謂的「新移民」做樣版化的標籤，例如「表姐你好嘢」中從內地來的「表姐」是非常老套、落後的。

除了大眾傳媒，政府政策對從中國大陸來港的人士取態亦慢慢變得負面。雖然現在香港政府開始對這群新來港人士提供服務，但其實在政府的政策中，亦都將這群人劃分為「他者」。從1974年開始，香港的移民政策一直在收緊，這背後牽涉到主流社會的輿論，和政府對從中國大陸移民來港人士的許多限制，例如居留權、申請公共房屋、和申請政府福利資格的收緊。這些限制反映了政府對這群人對香港未來的貢獻存疑。主流論述、大眾傳媒及政府政策的負面轉變，造成今天許多新來港人士要面對一個不友善，甚至存在歧視的社會環境。

除了主流社會的態度越來越負面外，新來港人士今天要面對的另一問題是經濟結構的轉變。主流傳媒多認為新來港婦女的就業問題是個人的責任。但當我們細看香港經濟結構在過去二十年的轉變，我們就知道有許多因素不是個人可以控制的。我記得當我在1979年來港後，我的父母都在工廠工作，當時我媽媽需要照顧三個孩子，她同樣要面對「如何兼顧家庭及工作」的問題，但當時的工廠有許多靈活的安排，令當時的婦女可以兼顧到家庭及工作，這當然相當辛苦，亦要付出許多代價。當時我的母親在一針織廠做「包頭」，即包裝衣服，那家工廠是幫「GAP」（美國時裝品牌）生產衣服的。工廠知道有許多婦女不能夠「朝九晚五」地上班，因為早上要帶小朋友上學，下午四時又要離開接小朋友放學，於是工廠就取消底薪制，設立「件工制」，只要她們能在落貨前趕起貨品就可以了，然後會逐件產品計算工資。當時我的母親「包衫」包一打會賺到一元或八毛錢，這個安排對婦女本身或對勞工來說是沒有保障，雖然他們在工廠中工作，但因為公司視員工為自雇人士，所以他們沒有得到任何勞工福利，但這種安排

令許多當時的新來港婦女可以兼顧到家庭及工作。

當時亦有另一個制度，就是可以帶工作回家做。這其實亦有不理想的地方，同樣是沒有勞工保障。但是你可以在家穿膠花、砌洋娃娃，我曾經在家釘「嘜頭」，這些情況以前有很多。但到了九零年代的時候，我們面對一些很大的轉變，就是「去工業化」。大部份的工廠都搬到中國大陸，這些情況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服務性行業的工作。一些工資比較高的服務性工作，例如時裝店售貨員，相對本地婦女，新來港婦女可能會缺乏競爭力－因為她們未必會說流利的廣東話，對香港文化的認識亦較本地求職者為少。

那如果新來港婦女要工作，可以做些甚麼呢？很多時候她們從事服務性行業中最低階層的支援工作，這些工作不但工資偏低、缺乏保障及福利，而且是非常「困身」的工作，工作安排缺乏彈性、且工作時間很長。我居住的大廈的清潔工作被外判給一間公司，我經常跟做清潔的女士（一位新來港婦女）聊天，她告訴我每個月只有一天假期，而她的工作時間由早上七時至晚上七時。這對要照顧年幼子女的婦女，包括新來港婦女來說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今天當我們談論新來港婦女所遇到的問題時，要留意兩個香港社會很重要的改變，第一是關於社會態度，第二是工業轉型及「去工業化」。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就是要理解這些婦女的家庭，大部份新來港婦女都是跟香港男士結婚的。我們談論新來港婦女時，經常只著眼這一群婦女，但其實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她們嫁的是甚麼人？」、「她們的家庭有甚麼成員？」。

根據2001年的人口普查，77%的十五歲以上的新來港人士都是女性，這跟香港以家庭團聚為主的移民政策有關。這群新來港

女性普遍都比較年輕，她們的年齡中位數平均為二十五歲，她們的教育程度都比較低，這跟我們的婚姻規範有關，因為男性普遍都不願意與教育程度比他們高的女性結婚，所以到中國大陸娶妻子的香港男性如果本身的教育程度不高，都希望與一些教育程度相若或更低的女士結婚。新來港婦女教育程度偏低，進一步限制了她們在香港勞工市場的機會。

就勞動力參與方面，新來港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與整體人口比較，相對低一些。最主要的原因是她們需要照顧年幼子女，背後原因當然是因為香港的託兒服務非常不足。而有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新來港婦女(我希望繼續以「新來港女性」代表那群來港未夠七年的婦女，但希望不要誤會我把他們標籤化)，大部份從事服務性行業及非技術性工作(佔約七成)。她們收入普遍偏低，在2001年每月收入中位數為六千元。

家庭人口數目方面，她們的家庭比整體家庭的平均人口數為高，因為她們有較多小孩。但她們的家庭收入中位數比總人口低三分之一，根據政府在1996年進行的一個調查，新來港女性的丈夫月入中位數比整體人口低11%；接近三成(26%)新來港婦女的丈夫是非技術性勞工，相對整體人口非技術性勞工比率17%為高；過半新來港婦女的丈夫只有小學學歷，這跟整體人口中擁有小學學歷的百分比(23%)亦有很大距離。這些數字顯示，這群女性的丈夫很多生活在社會邊緣。新來港女性與丈夫平均年齡差距為六歲，整體已婚人士平均夫妻年齡差距為三歲。所以新來港婦女的很多時候牽涉到「老夫少妻」的問題。根據2001年的資料，35%新來港婦女比丈夫年輕十年以上。我們發現很多時候，這些年長丈夫的性別意識或對婚姻的期望與較年輕的妻子十分不同。我與張越華教授在水天圍做研究時發現，當他們的妻子外出工作時，這些年長男性的危機感很強，一方面他們的性別意識保守，所以很希望自己可以當家作主，當他們在經濟上不能獨立支

撐家庭，而妻子需外出工作時，他們自覺男性身份受到挑戰，因而造成很多衝突。

另外，受現行中國移民政策的限制，很多新來港婦女婚後都需要和丈夫分開一段很長的時間才可移民來港一家團聚。很多時候，當她們在中國大陸時與丈夫相處並沒有問題，因為丈夫大多只在節日和假日才回去，每一次回去的時候他們都會穿最漂亮的衣服、帶很多禮物，表現自己最好的一面。但當她們來到香港之後，要面對的往往卻是一個截然不同的處境。

在2007年我與張越華教授對居住在水圍的新來港婦女進行了研究。在這個研究中，我們共訪問了八百七十個家庭，約一半是本地家庭，另外一半是「新移民」家庭。在每個家庭中，我們訪問丈夫，亦訪問妻子。在與你們進一步分享我們初步的研究結果前，我希望強調水圍只是我們選擇了的一個個案及地區，我們並不希望標籤水圍，我們相信在水圍所見的新來港婦女的處境，其實跟其他的社區，例如深水埗、觀塘、東涌、元朗的新來港婦女情況相若。我們關注的問題並不是水圍獨有的。

在我們的研究中，新來港婦女與丈夫平均年齡相差九歲，而他們十八歲以下子女的數目比本地家庭多，有1.5個；而伴侶(丈夫)的教育程度相對本地其他男性為低。在新來港婦女丈夫中，受過高中或以上教育的只有24%，相對本地其他男性的38%低了很多。我們所調查的新來港婦女的伴侶的失業率頗高，有差不多10.5%。即使這群新來港婦女的丈夫有工作，也只從事低下階層、低收入的工作。更重要的是，這群男性不單在經濟結構上及教育程度上較邊緣，他們的社會資本亦比其他男性為低。我們所謂的社會資本包括家庭及朋友的支持、社區和社會網絡參與、與社會控制指數等。

新來港婦女的丈夫的「家庭支持指數」及「朋友支持指數」比新來港婦女本身、比本地的婦女及本地婦女的丈夫都要低。還有社會控制指數，所謂社會控制是指個人行為會否受朋輩壓力，和社區輿論壓力所規範。我們發覺新來港婦女丈夫的社會控制指數最低。也許因為他們朋友不多，很少參與社區，與其他人的關係淡薄，因而不太在意其他人對自己的看法。此外，我們亦發現新來港婦女的伴侶的性別意識比本地婦女的丈夫保守。

我們的研究主要關注家庭暴力。令人關注的是我們發現新來港婦女的丈夫對伴侶使用暴力的情況相較其他家庭中的男性嚴重，尤其是丈夫對妻子的性暴力特別嚴重，也許這跟家庭中夫妻關係、男性自我身份的危機感、及夫妻間較大的年齡差異都有很大的關係。

這些婦女來港的時候，她們不但要面對一個陌生和不太友善的社會環境，她們在家庭中亦要面對很多的挑戰及限制。這群新來港婦女的「社區參與指數」比本地婦女高，因為她們經常需要接觸建制性的組織，例如使用政府、社會福利署等的服務。相反，本地出生的婦女比較少接觸這些建制性的網絡，因為她們的家庭支持及朋友支持都比新來港婦女為高。我個人認為一些建制性網絡(institutional network)，如：社工、綜合社會服務中心、家庭服務中心等對於婦女來說固然重要，但建制性網絡與家庭朋友網絡所扮演的角色畢竟非常不同。在社會控制方面亦一樣，新來港婦女的社會控制指數都比較低，因她們與鄰里的關係比較薄弱，她們所做的任何事都較少受到鄰里的規範。

因此，我們暫時可得出的小結為：如以天水圍作一個例子，我們從社會資本的角度看便可發現，這群新來港婦女的鄰里關係頗為淡薄，她們缺乏家人與朋友的支持，她們有社會參與，但基本上是接觸一些建制性的網絡，在她們有需要時尋求幫助。但

這些建制網絡是否是讓她們融入社會的最好階梯呢？這些都需要再作討論。至於經濟方面，新來港婦女普遍面對非常大的經濟壓力。她們當中有三成憂慮入不敷支，一成四有債務困擾。在中國人社會，大多數經濟上的支持都是由朋友及家人提供的，但因新來港婦女這方面的網絡較少，因此可以相信她們在經濟上所得到的支持會較本地出生的婦女少。在情緒上的支持亦一樣，雖然社工能夠為新來港婦女提供幫助，但若她們真的受到情緒困擾，未必會找社工幫忙，因為在傾訴時始終有距離。我們相信朋友及家人網絡薄弱的另一結果是，新來港婦女得到的情緒支援亦會較本地出生的女性為少。

我在總結中希望分享的是：如果我們希望了解新來港婦女的情況，我們需要明白她們所面對的結構性限制，但我不希望我們在討論結構性限制時，忽略了這些婦女的主體性及自主性。在研究過程中，我們除了做問卷外，亦有跟這些婦女傾談，當中令我覺得很佩服的是這些婦女雖然面對困難處境，但她們仍十分希望改善生活，她們作為媽媽的身份很強烈，這身份支持她們不會輕言放棄。她們對家庭的承擔很令人佩服，她們的處境有時確實非常惡劣，尤其是剛才所見的某些數字，但她們對家庭的承擔沒有因此而受動搖。如我所訪問的部份婦女般，每當家庭有危機時，她們都支撐著家庭。

我們的社會每當談及新來港婦女時往往提到她們想得到社會提供的福利，但其實大部份新來港婦女都積極投入勞工市場，為社區作出貢獻。在我們身邊，例如我剛才提到為我居住的大廈清潔的女工，有很多新來港婦女，她們年中無休，在不同崗位默默地工作。她們對社會的貢獻卻在主流論述中被淹沒了。現在政府對這些婦女所做的，大多只是支援性的工作，但我覺得只有支援並不足夠，更重要的是在結構性問題上改善她們的處境。前天是五一勞動節，我不明白為何到了現在「最低工資」都仍然在討論

中。我認為無論成立多少個家庭服務中心，都不及對最低工資立法，更能改善新來港婦女的處境。

除了最低工資立法外，另一需要作出改變的結構性問題是邊緣社區的發展規劃，現在大家對天水圍的看法也許是多加些游泳池、籃球場、圖書館……但我們何不重新思考我們的社區規劃？為何要將所有邊緣階層都放在同一個社區？這其實是一個很壞的社區規劃。我記得我在1979年來港時，香港的社區規劃並不是這樣的，我當時住觀塘，而觀塘有中產階級居住的月華街，有低下階層居住的雞寮，但雞寮跟月華街的小朋友都同樣可以在區內最好的學校學習。其實當時的社會比較能夠接受不同的階層在同一社區生活。中產階層在社區的存在保障了社區設施不易出現敗壞、缺乏維修等負面變化。今天香港的社區規劃產生了很大的問題，現在天水圍的討論仍然未能帶出問題的核心所在，現在的房屋政策將一群最需要跟市區結合的人放在這一個偏遠的地區，如你用一個社會資本的角度看，就算你為這群人建立多少社會網絡作用都不大，因為他們的社會網絡都不是優質的社會網絡。例如，我認識了鄰居陳太，陳太是一個清潔工，所以只能介紹我做清潔工；但如果我的鄰居不是清潔工，而是受過教育的文職工作者，他可能可以提供更多更優質的資訊給我，例如關於孩子讀書、不同的工作機會等。

我覺得現時政府就新來港婦女需要的討論十分不足，只有一些關於支援的論述，但新來港婦女需要的不是「幫助」，她們更需要社會結構上的改變，使她們能有平等的機會去參與。另外，現在我們談論新來港婦女的時候只著眼婦女本身，但我覺得很多問題本身不在婦女，而是婦女的丈夫，所以當我們談論如何協助新來港婦女、改善她們的處境時，應從一個家庭的角度，一個比較整全的角度去看。例如，在支援時可否將她們的丈夫也納入支援網絡中？若不改善她們丈夫的處境及看法，只改善新來港婦

女的想法，也許會造成更多的負面結果。在我們的研究中發現，新來港婦女參加了許多社工舉辦的活動後，改變了她們原來的看法，但她們的丈夫沒有被改變，於是她們帶了一套嶄新的、比較開放的看法回家，面對丈夫保守的觀念時，可能激發更多衝突。因為時間限制，我的分享到此為止，謝謝大家。

嘉賓發言

「新移民」婦女訪問經驗

陳惜姿女士

香港中文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導師
《天水圍12師奶》作者



各位早晨，我非常欣賞大家的誠意，在這天色灰暗的星期六早上依然準時坐在這裏。我很榮幸能獲性別研究中心的邀請來分享這個講題。事實上我真的有點班門弄斧，因為很多社工、社會學的教授、學者都在這裏，我的專長其實就只是做記者而已，所以我工作的單位是新聞與傳播學院。

為甚麼今天我會在這裏呢？就是因為我寫了這一本書《天水圍12師奶》。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沒有像蔡教授那麼廣泛、全面地去做很多的研究、調查及數據收集等等，只是單純地出於一個做記者的直覺去感受。我之前做過很多大人物、名人、學者、有錢人的專訪，但是當我不需要做記者，為糊口而奔馳的時候，在空閒、在暑假有時間的時候我就會想到：其實一群在社會中稍為邊緣的婦女，她們的聲音又有沒有人聽，故事又有沒有人寫呢？

我有一個認識了十幾年的老朋友Winnie(譚碧茵)，她以前是一個社工，現時在水天圍教授「再培訓班」的英文班。與她聊天時，她說她的學生很厲害，在其他區教書時，學生的出席率都沒有那麼高，但是天水圍那些英文班的學員都是風雨不改地去上課。而在討論當中，明明是教着英文，說着說着就會講自己「衰佬」、男女不平等的話題。與老朋友聊着，就覺得這些婦女的故事其實是沒有人寫過的，所以便構思寫出來。

其實我是零四年才開始到中文大學教書，零五年就遇上我的第一個暑假。我只能在工餘的時間去做，所以投入及努力程度都不及Susanne(蔡教授)之前那個有關天水圍的調查。

「時間」就是零五至零六年，那個時間是甚麼時間來的呢？這點稍後再談。「地點」就是天水圍北部，即是天恆邨、天澤邨、天逸邨等等，而不是天瑞邨、天悅邨。其實我到過天水圍很多次，那邊的司機都說在水天圍會迷路，即是這裡的規劃是所有

邨都差不多樣子，樓宇高度一樣，只不過是顏色不同而已，大家都是靠顏色去辨認哪條邨的。總之在水圍南部的屋苑，都是入伙有十年以上的，都尚算是一個規劃較完整的社區，有嘉湖山莊等等。如果大家相信一個社區應該有中產階層、公屋、居屋混合，才會有較多的就業機會，起碼想做家務助理都有人請，即嘉湖山莊的人應該可以聘請一些住天瑞邨的人去做家務助理，我就是這樣想的。但是水圍北就有少許生不逢時，詳情就不多說，大家讀過我的著作都會見到有寫九七後「八萬五建屋計劃」、「金融風暴」，那剛是水圍北規劃的時期，很多不幸的事都堆積在同一時間出現，以致該區明明有一大堆居屋，最後都會變成公屋，明明興建了很多停車場打算給中產階級使用的，但最後那些停車場全部都沒有車停泊，都被小朋友用來踢足球、打羽毛球。又因為那一區沒有任何足球場、羽毛球場這些設施，所以大家唯有去停車場打球，造成一個這麼怪異的情況。以上就是「地」。

而「時」就是在水圍發生的「四·一一」滅門案，即是零四年四月，金淑英的丈夫殺死了一對孿生女及太太。之後，水圍就開始被人叫做「悲情城市」，我們在水圍的街道上都會看到無端有宣傳海報寫着「無暴力健康的家」，整條街道都貼上了這些海報，你在旺角不會看見那些「無暴力健康的家」的海報，但是在水圍裡面都會見到的。

「人」是甚麼呢？其實我自己跟水圍的關係不是太深，但是因為我的伙伴在水圍內的職工盟裏教英文班，於是由工會介紹了一些婦女與我傾談，因此你亦會見到，我訪問的那些婦女其實是一些比較積極的婦女，她們都主動去讀書、去進修，起碼她們不會是那些隱蔽的婦女。

其實我亦遇過一些較隱蔽的婦女，她們聊着聊着就會不肯說下去，甚至到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這些接受訪問的婦女只是講

了很少部分的故事，因為她對我沒有信心，亦因為她們自信心不高，沒有自信將自己整個故事講出來，她覺得別人會取笑她，是不光采的，而她們很多時候覺得很多不幸是出於自己，這是很淒涼的，因為無論她們嫁了一個怎樣的丈夫，她總是覺得自己錯，才會嫁錯人。當初以為他是老闆，來到香港才知道他原來連米都沒有錢買，屋裏小得站都站不直(原來有些屋的樓底高度是低過一個人的高度，例如那些小石屋)。她們覺得自己很倒楣，將責任都歸咎於自己，所以她們其實沒有勇氣將自己的事情告訴我，這亦是一個訪問的難處。

為甚麼說她們是生不逢時？因為她們大都是九七年之後以「家庭團聚」理由申請來港，她們的丈夫很多都是建造業或基層職業的工人。這班工人在金融風暴之下的受到很大的打擊，光是樓市下跌已經對建築工人有很大影響。他們說，以前做「釘板」都有七百元日薪，但現在的工資連以前的一半都不及，他們都要繼續做，因為除了這些工作，他們再沒有其他工作可以做。有很多包括水喉工、電工等，他們的工資全部都下跌，於是他們的伴侶，即女士們都變成了一班新進的窮人，即是說天水圍住進了一班新進的窮人，包括一些工資嚴重下跌的人和他的家人、一些破產、輸光股票的人，輸掉自己的屋之後去申請公屋，又被編配到了天水圍，於是天水圍北就集結了一班這樣背景的人。

我的訪問方式是怎樣的呢？其實我試過很多方法，因為我沒有被「研究」這個枷鎖束縛著，於是我可以很自由自在地去做。忘了說，剛才相片中踏單車的婦女雲姐，她現在變得很有名。她是唯一肯上鏡頭，肯告訴別人自的真實名字的受訪者。她就踏著那用了二十多年的單車，穿梭元朗各區去做家務助理，一個人做八份工，她有四個小孩，丈夫已經拋棄他們，她獨力把兒女養大，她現在成了婦女們的偶像。近來有一間店舖開張都是找雲姐去剪綵。她非常威風，每次打電話給她，她就說自己很開心，很

虛榮，因為我把她的電話號碼存在手提電話裏……她是一個很樂觀的人，很會逗人開心。

小組訪問方面，開始時我覺得可以集思廣益，可以用腦力激盪(brain storming)，所以約了一班婦女出來，結果是失敗的，為甚麼？首先，原來她們自己的朋友都不多，她們不會約三、四個很要好朋友出來，因為她們根本沒有這樣的一班朋友。雖然每個人都是新移民，住在同一條邨，但是她們都很少有機會聯絡，更不要說有知心友了。為甚麼不能成為知心友呢？還是那一句，她們覺得「家醜不出外傳」，很多時候那些所謂「朋友」，其實即是那些坐在學校門前等放學的婦女們，大家只會聊聊小朋友讀書的問題，都是十分「離身」的問題，她們相當保護自己，有一些話題可以講，但自己的問題就很少提及。如果不透過社區組織，她們認識朋友的機會就真的很少，但是我想可能她們覺得找社工，是很不吉利的事，好像有什麼壞事情發生了，所以她們都沒有去社區組織。其實她們也會一起打麻雀，當中亦會閒話家常，但是今天如果你在麻雀桌上說了一些事出來，不日就會在別的地方聽到自己的故事，於是她們就學會了在麻雀桌上還是談一些無謂的事罷了，所以小組討論就失敗了。

後來有一位婦女告訴我她在說謊，她說自己丈夫原本有七百元日薪，而現在賺四百元都要繼續做下去。到第二次小組討論的時候，這位婦女勇敢地對著其他幾位婦女說：「其實我在說謊，我丈夫已經中風了。」她丈夫的年齡比她大十到二十年，又喝酒，最後中了風，已經癱瘓了，不能工作，只能領取綜援。該婦女為自己說謊的事很不開心，在第一次小組討論後心裏覺得鬱鬱不樂，到第二次小組討論她決定要將心裏的話說出來，便覺得很釋懷。我本人不是社工，所以我不敢去肩負這些婦女在眾人前剖開心扉的沉重壓力，因為我想這需要專業的訓練才可以做到，所以我就做不到，於是我就想：不如個別訪談？

在個別訪談中，她們反而喜歡談多一些。小組討論的時候她們沒有那麼活躍，只是問一句答一句。最多問一句，每人輪流答幾句，內容不深入，很難寫一些甚麼出來。在個別訪談中，我發現原來她們很喜歡、很渴望被了解。Winnie，我的夥伴，她坐在我旁邊整天說：「讓我學學你怎樣採訪的。」其實我沒有甚麼東西可以被入學，因為我問一條問題之後，受訪者就滔滔不絕地全部說出來，基本上訪問技巧的很少的，只需要聆聽就可以，需要的只是聆聽技巧而不是訪問技巧。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把自己整個故事說出來，她們都很驚訝為甚麼我們會去訪問她們。她們覺得自己的價值太低了，怎麼會有人會由九龍過來天水圍訪問我們的？我都不敢告訴她們我在哪裏工作，如果告訴她們，會令她們覺得：「發生甚麼事？大學的人來做訪問……」她們完全覺得自己的層次很低。

每一個訪問都做了兩、三個小時，很多人訪談時都哭了，最後有很多人都有些心裏話不敢說，又或者越說越多，令我覺得控制不了，譬如有位婦女說有一個小朋友經常受到很大的壓力而導致有精神問題，有另一位說到丈夫因為沒有工作而留在家中，很憤怒，於是便遷怒於兒女，逼得他們有精神困擾。我很同意蔡教授說這不是一個新來港婦女的問題，而是她們面對一籃子的問題：丈夫沒有工作，之後在家裏如何逼子女，因此也影響子女讀書，自己也不懂得教，又沒有錢讓子女補習……這一連串的問題令她們的情緒非常低落，一直沉下去，找不到任何盼望。

我們有很多的發現，又例如有些婦女是被「連根拔起」，她們有些是從茂名來，又有從陽江來……基本上來到天水圍後，她們與之前所有的事物完全被斬斷了。她們如果真的受到很大壓力又捱不住的時候，間中亦會打電話回大陸的故鄉，但是電話費是一個問題，她們連手提電話的通話時間也盡量節省。她們叫我

盡量致電家居電話而不要致電她們的手提電話，她們都是用儲值卡，用完就要增值。

她們的丈夫如果有工作，大都是工時長工資低，沒有多少時間給太太，所以在情緒上，婦女是沒有人跟她們分享、分擔的。另外，她們最擔心就是「朝不保夕」，有一位受訪婦女的丈夫的工作是超級市場倉務員，待遇也是可以接受的，超過一萬元，但是她非常害怕外判風潮降臨到丈夫身上，那就會一無所有了。因為她覺得自己沒有用，要照顧幾個小朋友以致無法工作。她的工作觀是怎麼樣的呢？她覺得不能賺錢的工作就不算是「工作」，帶小孩、做家務不能賺錢，於是便不是「工作」，她不覺得這些勞動是有價值的。她覺得自己終日做一些沒有價值的勞動，於是自我價值很低，亦擔心倘若丈夫的工作一旦被外判，或是不獲續約，那就糟糕了，這些焦慮很折磨她們。我們發現，她們無處發洩這些鬱結，所以很多婦女都患有情緒病。這些情緒病亦為她們自己帶來了另一種憂慮——不知自己是否患有精神病。因為住在水圍區，患精神病是會被送到去「青山」（青山醫院，提供精神科住院服務予新界西區之市民），她們不敢說出來，她們對於自己身體的變化越來越害怕，她不懂得該如何處理。

（展示照片）這就是在停車場內打羽毛球的情況。你會看見一輛車都未在這裏泊過，地上連少少的黑煙噴過的痕跡都沒有，基本上是浪費的。不過到現在為止已經有所改變，因為房署已經將這些停車場轉變為其他用途，可能被其他人租用等等。

為了節省車費而足不出戶，令她們的出外見識機會都下降了，所以她們都說自己是「天水圍人」而不是「香港人」。她們不覺得自己是香港人，她們甚至講不出香港有多少條隧道；或者一些基本知識，可能小學生通識科要學的知識她們都不知道。她們的小孩又抱怨整天都不出外，想不到作文題目。

我們亦發現她們就算需要醫療用品，或是電髮，全部都要回去大陸才買、才做。所以會看見一些婦女的頭髮由耳朵開始是金色的，近頭頂的全部都是黑色的。我就問為甚麼會染成這樣，她說原來這個髮色是上一個聖誕節染的（我問她的時候已經是夏天），那是在大陸的朋友免費幫她染的。即使丁點兒的事情她也不會在香港消費，因為香港的消費實在是太貴了。藥油、退燒藥全部都要在大陸買。

有一位婦女跟我說她很懷念自己有「單位」的日子。她在大陸跟她同齡的同事都差不多退休了，她覺得住在大陸，退休之後有很多事情都有保障，看醫生又有安排，不用花錢。她很掛念自己的「單位」，我幫她補充一句：她很掛念社會主義的各種福利。來到香港，在自由經濟下所有東西都很自由，她反而很不習慣，因為她沒有了那些層層疊疊的已安排好的福利。但亦都有比較豁達的婦女覺得她以前在農村的家，連塊地板都沒有，現在的膠地板雖然破了，沒有錢修補，但是起碼都算有地板。這個婦女很豁達，很感恩的。

有位婦女的孩子有智力問題，她覺得幸好孩子生在香港，能夠自小接受特殊教育。她說如果在大陸，這種小孩就會沒有書讀，所以她很感謝香港有這些福利。

她們有甚麼禁忌呢？是有很多的。首先「新移民」這個詞語已經是禁忌，我自己就覺得因為「新移民」三個字壓低了她們，就以為所有的「新移民」都是一個樣子的，我們忽視了每一個人都是不同的，每一個人的程度亦都是不同。「為甚麼我就算如何努力，這些人都將這三個字套在我身上呢？一旦我是新移民，你就會把一整套看法加諸於我身上呢？」這個想法我想她們是最受不了的。

她們很努力去擺脫自己的口音，擺脫不到的就乾脆不說話，她們覺得一開口說話就會被人笑。有一位婦女說她在水圍的街市買菜，有個魚販說水圍的人全部都是垃圾。他自己也是在水圍擺攤，竟然會說這些話。於是婦女們就更加不敢說話，因為講少些就被人少鬧一些。

有人說她故意填以前的家庭地址，譬如丈夫以前的公屋在上水，一、兩百呎。因為家庭團聚可以遷到一間較大的房屋，於是就搬到水圍。但是「水圍」這三個字令到她們很難找工作，出到青衣、旺角找工作，每見到「水圍」這三個字就不會聘請她們，會覺得她們住那麼遠，一定會遲到，而且車費那麼貴，一定不會做。於是她們就不寫「水圍」這三個字，申報舊地址也好，申報朋友的地址也好。這件事不單是基層市民在做，連嘉湖山莊的住戶填地址時也只填「新界嘉湖山莊」。其實很多不同的人都在講同一件事，連港大的一個女同學都說她不會跟別人說自己住水圍，因為水圍存在太多問題了，「你告訴別人自己住水圍，別人就會問你很多問題。如果我告訴人我住沙田，別人不會有問題問我的。」但是每當告訴別人自己住水圍，別人就會問你「那裏的人是不是這樣的？」「你如何應付？」諸如此類的問題。她覺得要應付那些問題很煩憂，乾脆不告訴人自己住哪區，反正寫「新界嘉湖山莊」，信件也能寄到。

另一個禁忌就是她們覺得自己的丈夫很年老，身體有病。因為賺錢糊口對她們來說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一旦賺錢的人有事，甚至要靠領取綜援糊口，那她們就會感到完全抬不起頭。綜援、情緒病，剛才已經說明過。

其實疾病對她們來說是一件非常令人恐懼的事情。例如有個婦女肚子疼，害怕自己有婦科病。我們最直接的反應是「有病不就看醫生？」，原來「看醫生」這三個字對她們來說又是一個

很大的壓力。看甚麼醫生呢？公立醫院又要排期又要等很久，排一年才可以，豈不痛到死了；私家醫院看一次專科要八百元，她又何來錢去買菜呢？這些全部都是些非常悲慘的事情。

充權方面，蔡教授叫我講多些比較正面的事情。其實我出書之後，都覺得有很大的分別。不是我寫的那本書的問題，而是一再有悲劇發生，天水圍已經得到很多人的關注。現在的情況已經不同，我講的都已經是兩年前的事。首先她們得到的是一種說話權，有人聆聽的權，姑且稱它為「話語權」。有人已經可以站在她們的立場去寫她們的故事，我覺得這本書做不了其他事情，但是至少都做到這一步——就是令婦女們覺得這本書是為她們發聲的。其實對話過程已經是一種治療。有個婦女被訪問完之後，翌日特地去職工盟的中心叫姑娘帶個口訊給我，說很感謝我們，覺得從來未感到如此舒服過，效果比看醫生更好。她真的很舒服，很開心。我自己覺得，光是做完那次訪問就已經對她很好的了。她們肯接受訪問其實已經解決了很大的問題。

如果是有問題的人，大部份根本不會接受訪問，所以亦都有很多隱蔽婦女的例子。婦女們聊着聊着就講不下去，又不許我們寫，說從來沒有對其他人講過這些話，只跟家裏的觀音講過，我們是除了觀音之外，第二個聽她講這些話的人，然後都不肯再講下去。其實她最後都離開了家庭，搬走了，不理會兒女，因為丈夫打她。這些都是一些我們很擔心的個案，但是這些是一些非常隱蔽，連社工都找不到的個案，因為她們根本就不會跟社工傾訴，只是跟觀音傾訴，社工如何知道？所以這些都是我們擔心的個案。

書推出之後，每當我們收到一些好評，我們都會印出來給婦女們看，如果她們看不懂繁體字，我們會讀出來讓她們聽。她們很開心，覺得非常安慰，覺得自己很有權，很有能力(powerful)，

覺得很厲害－只是一班女人竟然可以改變人們的看法，甚至覺得可以幫到整個社區。

有些價值觀可以重整，為甚麼？譬如她們領取綜援，接著去做些兼職。別人就會覺得她們犯法，她們就會一直覺得自己很委屈，覺得自己是一個罪犯。有人看到這行為其實是正面的，她們是為了家庭，其實在做好事。這樣能把她們負面的價值觀扭回正面。另外她們認為做家务、帶小孩是沒有價值的，但這些工作根本是有價值的勞動，這些正正就是要幫她們扭轉負面的看法。這些都是一些改變來的。

剛才尤太都說過社會企業。其實我們一直都幫她們想她們的出路會是怎樣，我們也試過幫她們找工作，但那些工作來來去去都只是二十元一小時，都是做得非常辛苦的工作。每天要做十二小時，根本就不能照顧小孩，對她們來說是沒有可能的，小孩都那麼小，怎麼辦呢？於是我的夥伴Winnie，就幫她們開辦了一個小小的社會企業。她就取了一堆有機豆回來，婦女就用她們最擅長的專長－烹飪，做饅頭、豆渣、豆漿……總之由大豆製作出來的一些產品。這些我都沒有機會參與，因為要在大學上課。所以我寫完書之後就將責任交給了Winnie，她就做了這個新局面出來。她有幾個堅持，其中一個就是「婦女勞動有價」。這裏寫明「從天水圍十二師奶開始」，即是裏面有很多婦女，分佈在其他區，例如大埔區，但這些都是以天水圍婦女為主的一些事情。在她們工餘的時間，可能她們的小朋友上了學，她有幾個小時可以弄自己的東西拿去賣，這就幫她們維持了三十五元的時薪，因為Winnie覺得不可以剝奪婦女們。做工歸做工，賺錢歸賺錢，但你不可以靠剝削婦女來賺錢。所以不管怎樣都要維持三十五元時薪，這是她們應該得到的三十五元。社會人士亦都會支持，都會買她們的產品。而這張漂亮的單張是社會人士義務幫助她們設計的。其實出書之後，幫忙的聲音是像雪片似地飛來，有補習、捐

贈等等，以致職工盟要特地安排多一個社工去天水圍應接這些東西，去做很多組織方面的工作。這是一條小小的出路，看看能不能幫她們建立一個事業(career)。當中當然有很多沒有效率的事情，譬如叫人試吃又不懂叫人買，懂得叫人買又不懂寫單據……像一隻牛一樣只會做，而做法還需要很多的教導，所以這條路仍然很漫長。

我的分享就到這裏完結，稍後答問時間再談，謝謝。

嘉賓發言

新來港婦女的歧視、經濟、支援問題

楊媚女士
同根社主席



多謝台下的嘉賓及朋友。我有幸來到大學，因為我是一位新來港婦女，沒有機會在香港讀大學，今天很榮幸能來到這裏，多謝大家。我有機會在這裏演講，希望大家能夠明白我的意思，以及原諒我可能說得較混亂。

同根社的簡介剛才基本上已經說明過，因為時間有限，我不會說太多同根社的事情。其實我們是沒有職員的，全部都是由我們一群婦女自己組織起來工作的。我們是希望幫助新來港的婦女，特別是2004人口政策出台之後，有一些「隱形」的婦女，她們來到香港只知道自己有問題。政府規定住滿七年才有房屋、醫療等等福利，她們覺得這是自己的問題，不敢求助，很多都不會跟社工朋友講這些問題。

補充一點，同根社是在2000年成立，因為當年政府多數都會批准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香港男士在大陸取妻的那一班婦女來港，她們都是在結婚後十年到十二年才來到香港。來到香港的時候，她們的孩子都到了小學或者中學的階段，來港後很難去選學校。婦女不是住天台，就是住板間房。很多小學都不取錄她們的小孩，結果她們都為小孩報讀旺角一家小學，因為只有這一間小學肯取錄他們，以致那兒全部都是新來港婦女的小孩，而那學校門口也聚集了一批新來港婦女。她們聚在一起時都說同樣的話，因為大家的背景都相同，結果她們就常聚在一起。有一次她們在旺角窩打老道附近，那兒有一間「楊震社會服務處」，有個社工跟她們說：「你們可以來我們中心。」中心提供了一個有板瓦的地方供她們聚在一起，愈聚愈多，互相去探訪，互相支持。一直以來我們都沒有想到「政策」這個層面，因為在大陸永遠只服從上級，只遵守上級的最高指示，不太有機會一起討論、監察政策。自從2003年政府推出「七年期」的人口政策，威脅了未來的新來港的婦女，我們多了討論，所以我們的組織亦漸漸成熟，更在2004年註冊為一個正式團體，當時更靠朋友的幫忙申請了樂

施會一年的資助(2004年4月至2005年5月)，那就有了這一年的基礎，有租地方、聘請職員的資金。

雖然我在2002年才加入同根社，只是一個普通會員，而當時我的小孩還很小，來香港時還在讀幼稚園，2004年，在職員的帶領下，因為「種族歧視」立法不包括新移民，所以我就參與了這個討論，認識到延續這個團體的必要性。但樂施會的資助為期只是一年，於2005年5月之後就結束。在這個環境之下我就覺得同根社的存在是必要的，所以我就與同根社內所有的姊妹合力發展了一個基金。我們每年都要靠姊妹們去籌款，正如剛才陳惜姿老師所言，我們最擅長的就是烹飪，所以我們每年都靠一班婦女去煮不同的食物，找朋友發電郵，請他們來品嚐我們煮的食物。在2005年尾，因為我們沒有特別了解當日在香港有世貿會議，所以在2005年12月16日舉辦第一屆的貧窮宴，那次的經驗令我們同根社姊妹們到現在還記憶猶新，因為大部分人都去世貿會議那邊，我們這裏一個客人都沒有，更不用說捐款、品嚐我們的食物等事情。

我們在旺角，是借教會的地方去舉辦活動。為甚麼我們的社址會在旺角呢？因為大多數的新移民婦女，特別是在2002至2003年間，都是住在旺角、深水埗，所以我們就借用了教會及其他團體的地方來定期開會，每個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日就是我們的聚會時間。姊妹都非常開心地出席，因為她們覺得回到了娘家，因為大家在這裏都是同聲同氣，大家都是同背景、同路的人，所以大家都覺得可以回來盡訴心事，自己家裏有甚麼開心與不快的事都可以在這裏分享。令新加入的姊妹有所得益的是，舊姊妹可以分享自己的經歷，讓她們知道原來他們是這樣走過來的。所以很多同根社的姊妹都得到了很大的幫助，因為他人的經驗可以幫助她們融入社會。這些都是同根社的宗旨，我們希望透過同根社，透過每次月會聚會，提升她們的意識及能力。

我們在每次月會都會討論一些熱門的社會議題，包括政策、社會資源，與政府部門有關的問題。透過這些月會，我們知道很多姊妹已經融入、投入了社會，有些姊妹可能已經做「阿姐」級別，能夠接到工作。因為香港現在有很多外判工作，她們可能已經在工作中。但是在最近2007至2008年所做的工作就比較煩悶了，因為多了一些熱線電話求助的工作。而熱線電話求助工作所帶來的問題就特別嚴重，特別是在放寬自由行之後，內地人士、持雙程證來港的人士多了，求助的問題多不勝數，我們都是以義工形式去幫忙其他人，因為我們沒有資金。

我們在2005年的籌款活動中失敗了，有了這深刻的教訓之後，我們就知道要去了解這個社會發生的事，不要與一些大項目撞期。我們在2006年繼續舉行這類籌款活動，但是在2006年還是沒籌到足夠的款項，幸好在我們沒有資金租地方時，一些民間團體及大學的朋友繼續留一些地方給我們，讓我們可以堅持下來。在2006年，我們帶領姊妹們一起去參與社會政策的討論，包括「最低工資」、「退休保障」等話題。我們都積極地去參與，因此很多的民間團體、社會團體認識我們。

在2007年，我們籌到了三萬元，我們就用來歸還過去一年的租金、2006年會務的工作及會員的車費津貼。因為我們出外倡議政策及去立法會開會，與民間團體、大學的一些交流，我們都要報銷車費予姊妹們。所以我們在2006至2007年這兩年就有比較多人認識同根社這個團體。我們亦都努力爭取一些機會去出席電台、電視台的節目。例如在電視節目「總有艷陽天」也會見到我的。我們想被更多的香港人、更多的新移民認識同根社，認識我們這一班來自大陸的婦女。我們不是外面很多人標籤的「依賴政府、搶綜援」的一批婦女，現在我會分開四點去分別說明新移民婦女的各種情況。第一是她們來港受到的歧視，第二是她們的經濟，第三是她們的婚姻及家庭暴力，第四是她們中港跨境婚姻存

在的多樣性及特點。

以下我就先談歧視：其實我們很多婦女來港之前，她們的丈夫、奶奶經常探訪她，又說媳婦很漂亮等等，她們都覺得很開心。當她們批准來港後，她們就會面對住屋、適應的困難，大多數都會被她們的丈夫歧視，左說一句「大陸婆」，右說一句「大陸婆」，從不叫她做太太或稱呼她的名字，又罵她們「大陸婆，你懂甚麼？」。而她們的奶奶看她們就像是眼中釘一樣，整天都看不順眼，把她看成是一隻豬、馬、狗，不斷罵她，就算稍為睡晚一點都會罵她「攤屍」等等，所以每一步都走得非常艱難，做每件事情都要很小心。每天做完家務後都沒有機會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只可取一張小椅子看電視，因為電視前面的沙發是給丈夫、小孩、老爺、奶奶坐的。每一天都要過着非常緊張的生活。令她們特別傷心的是是不受信任，有關家裏大小事，家人都不會跟她們商量，不會讓她們知道。甚至出外吃飯，都不會特地帶太太出外。有些書信往來，例如申請公屋等等，他們會遮蓋內容，只留簽名欄讓她們簽名。所以我認為家庭裏的歧視是很嚴重的，在家庭中存在這些歧視，令姊妹們整天過着緊張的日子。

社會上的歧視亦很大，包括主流社會都認定新移民來港都是為了領取綜援，好像在額頭上鑿了「領綜援」三個字一樣。特別有一些婦女帶着小孩坐在公園，都被一些途人說：「這些大陸婆一定是領取綜援，都不用上班，非常懶惰，一定是貪慕虛榮的。」都是當面指着該婦女來罵。該婦女就會覺得自己沒有犯錯，為甚麼要罵我呢？但她們都不敢回應。如果在一些公共場所，例如乘車、乘地鐵，衣着不太好，或者是帶着小孩，小孩在驚扭，在這些場合中很多時都會被一些歧視眼光去看待，心想這些低質素的人來香港把工作搶光，二、三千元月薪都搶去，令本地人沒有工作做。她們在任何的場合、任何的地方都會受到別人的歧視，聽到一些不好的說話。我們姊妹聚在一起都會共同提到

自己不同的經驗與感覺，這些事好像是家常便飯一樣，大家已經覺得麻木了。

我覺得今日要討論的，就是一個政策的問題，我想說這個歧視問題是由政府帶頭，雙重歧視我們這些婦女。為甚麼會這樣說？大家認定香港都是移民的社會，不斷有新移民來港，剛才講者都有提到，每個移民的階段都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人口結構。97回歸之後來港的婦女的確很難找工作，令她們很難面對家庭。在2003年經濟低迷，有五十萬人上街遊行的時候，政府覺得被將軍，不知怎麼辦，於是就要找人來背黑鍋，就找了這班最沒權、沒勢、沒有說話能力的新移民下手，推行這七年期人口政策。在這七年期人口政策下，政府有一些承諾，說有酌情權，有配套服務，但政府能否做得到呢？之後我講一些例子你們就會知道的。人口政策在2004年後開始實行，當時如何制訂這些政策？政府就告訴社會人士說新移民沒有貢獻，質素低，是香港的負擔。要她們居住滿七年，有貢獻，才可以領取綜援、房屋、醫療等等社會福利。這不是政府帶動歧視嗎？其實政府不認同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不認同新移民，分化香港人及新移民，並標籤了新移民是「沒有貢獻」的一群。既然政府都是這樣說，主流社會以及普通市民也有這種看法，很多大學生見到我就問：「楊媚，你做新移民服務？噓，有甚麼好做，你們大陸來的人都是貪慕虛榮罷了。」我聽到這些話就覺得很生氣，為甚麼主流社會有這麼多歧視眼光？都是因為政府帶動的。

很多時候有機會我都會講：為甚麼四年後的今日，政府大有盈餘，資金庫存這麼多，為甚麼不能撥一些資源來幫助一些新移民婦女，讓她們早一些適應新環境，讓她們學習，去解決新移民這一個負擔。這問題是沒有任何部門能夠回應我的。剛才尤太所說的服務，我是未曾聽說過的，原來有這些服務嗎？我們同根社的姊妹是遍佈全港的，有些姊妹搬遷到公屋，她們不會回來同

根社聚會，但每年都有百幾名會員續會的。我真的不認為她們有聽說過這一些服務，有些可能聽說過的應該是在2003年之前，2004年之後是完全沒有人聽說過的，所以既然政府都帶頭歧視新來港婦女，又根本沒有提供這些服務，這只是說說而已，我們如何不被人歧視呢？另外雙重歧視的問題，我想說說，種族歧視立法，是不包括新移民的，在2004年種族歧視立法時我都有參與討論的。我有見過現在的署長余志穩，他當時是何志平的助手，那時我跟他談過。我問為甚麼種族歧視立法不包括新移民？其實新移民本身就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的生活，不同的成長地方，來到這個新的地方生活，都是一個群體，他們根本就需要去重新適應這個地方。之前有很多例子都說明，新移民大都受到社會的歧視和生活的壓力，為甚麼種族歧視立法不包括新移民呢？但當時余志穩都沒有答覆，所以我現在講的歧視就說得簡單一些。我覺得很多時都是政府的政策有問題，政府覺得有好處就要去做，有黑鍋就要人去背，這些政策是嚴重歧視我們。

第二點，我就想談談經濟。貧窮及經濟，兩者是有關聯的。很多新移民婦女來港後就成了低收入家庭，甚至不幸地變成了單親家庭，她們都遇到了莫大的困難。首先討論單親人士，單親婦女在七年期的人口政策下，政府說明是會賦予酌情權的。但是現實情況是，很多單親婦女有經濟上的需要，或者有些婦女因為丈夫不能工作而有經濟需要，但是這些婦女往往沒有領取綜援，只能「一份綜援兩份食」，「兩份綜援三份食」，她們都是面臨這樣的情況，沒有能享受到酌情權。但是政府表示：「不，是有酌情權的，不少單親婦女在領取綜援。」對，但是她們要有工作才獲得酌情權。這個酌情權是假的。不管你的小孩現在是一歲或是三歲，甚至是十二歲，他們的單親媽媽要有每月1490元的工作收入，才有權申請綜援，才能獲批援助款項。如果這些婦女有能力去工作，都不會打算去申請綜援，就是因為她們的小孩還很小，需要照顧。其實這個條例同另外一個計劃－小孩滿十二歲，單親

媽媽才可以出去工作－是有抵觸的。為甚麼新移民婦女去申請綜援，不管其小孩年紀小都要婦女去工作？特別在假期的時候，小孩在星期天放假，或者是暑假、寒假這些長假期，這些小孩又怎麼辦呢？如果去找社會福利署要求酌情，要求在這些假期期間可以豁免工作去帶小孩，社會的答覆是「不行，除非你不領綜援，否則你每月都要賺這筆錢。」沒有商量的餘地，這些婦女就要面對家庭、教育子女的責任、社署的壓力及工作的壓力。「單親」這個身份很難出外找工作，多數都不會被聘請，因為學校大事小事都要找家長，家長就經常要請假。單親媽媽都要面對那些四方八面的壓力，所以她們每天的生活，長期的生活都要面對這些沉重的壓力。她們都覺得非常辛苦，不知怎樣捱下去。這就是新來港的單親婦女的問題，這些問題並不是尤太說的那麼輕鬆。

另外就是低收入家庭的婦女的問題，有些人覺得她們有丈夫養，這不是很好嗎？其實大部份的丈夫都是活在社會的邊緣，本身收入雖然穩定，但是工資都不太高，需要太太去幫忙、補貼。有一些婦女需要全日打工，有些姊妹去婚紗店工作，由早上做到晚上八、九時才回家。有些小孩剛升讀小一，放學回家，家裏一個大人都沒有。因為丈夫要去做Salon(髮型屋)，也是一份長時間的工作。那個小孩說小學一年班每晚有十份功課，那是一間天主教小學，母親九時下班，十時才回家煮晚飯，逼自己的小孩做功課，逼得小孩很睏倦，到第二天也未能做完功課。這生活很難受，不知該怎麼辦。要叫誰放棄工作呢？自己不想幹，但丈夫那份工作只有6000元月薪，叫丈夫申請綜援，丈夫又不肯，說外面的人會歧視他們，只有捱下去。結果要放置小孩去每月1200元的補習班，那個補習班只負責看管子女而已，也未能監管小孩把功課做完。當他們不知該怎麼辦，唯有放任下去，所謂「跨代貧窮」就只有這樣。我覺得，社署是不是應該提供一個優質的托兒服務呢？有一些婦女需要整天工作，如果沒有一個托兒服務、配套服務安排，這些婦女如何去安心做工作？特別是那些要申請綜

援的丈夫，現在是不能申請的，因為那些人都是2004年後才移民來港的。有些母親就要冒著犯「疏忽照顧兒童」罪行的風險去工作，有很多酒樓盛行「炒散」（做兼職），有些母親趁晚上有空去做幾小時兼職，但五時就要開始去做，那些「蛇頭」（找人「炒散」的人）一打電話來，就要飛身過去做。而丈夫在五、六時也未下班，所以在五至七時這段時間，子女就要自己獨自留在家中，因為父母晚上要打工，要凌晨十二時才回家，未必能跟進子女的功課。這就犯了「疏忽照顧兒童」罪，例如之前天水圍有一個兒童玩火，我跟他的家長聊天，他們就哭起來，他說不知該怎麼辦，唯有順其自然。另一個例子就是，有一個單親媽媽，她在假期也要工作，要她在大陸來港的年老媽媽照顧三歲及八歲的小孩，結果稍為不慎，那個三歲的小孩走去乘971號巴士過海。家裏的人都不知道如何找回小孩，終於警察致電他們說，在巴士站尋獲了該小孩，叫媽媽去接他，而且還被警察罵了一頓，亦說會控告她。該婦女當時的心情是非常急，急得想哭出來，還被人罵了一頓，她說她也不想這件事發生，這就是經濟問題導致的問題。

我覺得政策令社會結構改變了，一個丈夫的工作根本不能養起整個家庭，要加上婦女工作幫補才可以。這就造就了很多家庭問題，以及疏忽照顧兒童的問題。我希望同根社以及一些社會人士能夠改變政府的施政，希望可以改善高工時、低工資的問題，希望能夠早些為「最低工資」立法，對所有工人都有保障；以及有很多在職而貧窮的家庭都生活艱難，引申了很多家庭問題。

第三點，我想說明婚姻暴力及家庭暴力的問題。婚姻對一個女人來說是一個歸宿。我不知道香港的年青婦女會怎樣看，但是對我們大陸的婦女來說，嫁一個好丈夫，縱使他沒有錢，只要家裏齊全，就已經非常開心。我去理工大學跟同學交流的時候，問男同學：「全港有四成八男士上大陸娶妻，你們男同學有沒有

這個打算？」他們回答說：「不會輪到我吧……上大陸娶妻的男士，多數都是質素差的。」如果全部上大陸娶妻的香港男士質素都那麼差，為甚麼都有一半香港男人都上大陸娶妻？我們經常都這麼笑說。現在很明顯真的有四成八的男士上大陸娶妻，這批為數不少的婦女嫁到香港，很多都為此而後悔。她們都覺得：「如果我們不是嫁到香港，也不會落得如廝田地。」

我剛才說的「單位」可能大家都不明白，「單位」就是自己的「工作單位」，可能自己有一份好的工作，可能有一個好的公司機構－香港就稱「公司、機構」，在大陸是稱為「單位」的。好的公司機構即是一個好單位，但是很多婦女都不是太明白。幸好現在推行了自由行，大陸婦女更容易明白香港的情況。如果是我們以前的婚姻，她們沒可能過來香港，知道香港的情況。以前很難取雙程證，只有來香港旅遊，才有機會來一次香港，大多是五天或七天。

對於我們婦女，覺得婚姻是最後的歸宿，起碼可以好好的嫁一個好丈夫。結婚的時候是很開心的，是充滿希望的，是美滿的，因為丈夫每星期或每個月定期回去一次，這種短聚令婦女覺得很幸福，不覺有任何問題存在。但當該婦女來到香港之後，面對居住環境問題，文化差異問題及適應困難的問題，特別是管教子女這方面。以上種種的問題，都帶給婦女有很的大改變。有些男士在夫婦長期分開時，根本不會覺得有甚麼問題，因為每一個月都有1000到2000元家用給太太，這筆錢可以足夠她在大陸生活。丈夫已經習慣了原來的環境，亦習慣了有太太、子女，就是不習慣有一家人住在同一個地方。當婦女來港之後，就要住板間房、小屋。當兒女跟父親搶看電視，令父親不能看賽馬、足球賽，他們就會發怒，離開家裏。丈夫又要替小孩交學費，又要付租金，又要很多雜費，應付不來，所以就拋棄太太小孩。所以如果婦女來港後沒有問題，他們都不會來到同根社求助，不像尤太

所說得那麼冠冕堂皇，環境那麼好。婦女覺得婚姻令她們很憤怒，婚姻改變了她們一切。婦女們要去適應、面對，漸漸造成了家庭問題。有一些丈夫拋棄她們、有些丈夫因為長期分隔的關係，所以可以很容易在深圳有外遇，有了第三者，造成了離婚問題。很多婦女覺得婚姻很沒有保障，覺得來到香港很冤枉。

家庭暴力的問題由貧窮、婚姻造成，很多的問題亦都包含情緒。新移民的問題並不是普通的家庭問題，不是政府說「全部交給家庭服務中心解決」那樣容易。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是等你家發生「死人塌樓」才會去接觸你。一些普通的事情，例如情緒不好、不開心，不懂管教子女，向家庭服務中心尋求協助的時候，那兒的工作人員不是休息，就是沒有空。我們有一些婦女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又未到離婚這個地步，不知道怎麼辦。雖然我不是社工，但我是以過來人身份、姊妹的身份去跟她分享。我亦希望會有一些社工可以去跟進她的個案，給予她們清晰的指引，或轉介予家庭服務中心。但她們會返回來求助，她們說：「每次約(社工)都沒有空接見她。」我們很難找到那個社工，如果我們陪她一起上去找社工，他就會說：「你想怎樣？要不就離婚吧。」她們最終都是想離婚。所以我在屋邨，很多男士見到我就問：「你是不是社工？」我回答不是，他們回應說：「社工最不好，整天叫我們離婚，教婦女離開我們。」他們又這樣說：「我太太好端端在家，吵架當然有的了，吵兩句就說離婚，就這樣走了。」雖然我不是社工，又不懂香港文化，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婦女，但我都做一些社工類型的工作，都被其他人誤會是社工，有時都會被人罵。我覺得這個家庭暴力的根源是配套服務不足，以及服務中心不能支援，婦女的家庭問題不是普通的問題。剛才都講到的是第三點。

因為時間有限，我就把第四點講得簡短一些。就是「中港跨境婚姻的多樣性及問題」。現在的環境哪有一個男人能夠儲到

一筆錢才生仔，現在很多返大陸娶妻的男仕已經三十幾、四十幾歲；我在立法會開會時，政府官員說，他們應該要有計劃嘛，無錢就不要生孩子呀…你們認為這些評論是否合理？是否以家庭為本？結婚生孩子是個人權利，亦是一件喜悅的事情，因為有一個新生命。但是很多丈夫如果在香港要生仔要去借錢、借「貴利」（高利貸）去應付開支，因為他們根本無可能儲到一筆錢去生仔；在大陸，如果有了第一個小朋友，就不能有第二個孩子，否則要罰十萬蚊以上，所以太太會去墮胎，好多雙程證媽媽都不敢再生孩子，這些都是悲劇。我覺得政府掛住去賺錢，剝削他人，根本就沒有體諒他們的需要，至於醫管局都賺好多錢，三萬九的收費政府又賺錢，現在社會討論的醫療融資，我們是不同意的。

提到雙程証媽媽，政府說早日放寬雙程証人士來港，早日認識香港，可以熟習香港；你們認為可行嗎？雙程証婦女的「盲公竹」就只有她的丈夫，她們能參加甚麼活動呢？丈夫日日趕返工，隨時都擔心無工開，那有時間帶太太周圍參觀？甚或有些丈夫會控制太太，怕她出街，一日只給她20元買餸，她那裡有錢坐車去探朋友、同鄉，她們根本無機會外出，就算我們中心找到他們，我們會邀請她們來參加小組，住得遠的，他們都不會來，住得近的，他們會走路過來，那就有機會認識部分住得近的婦女。她們很多時都是在一間斗室裡面，每日等丈夫回家，為他煮飯，沒有期望、無朋友、無親人，她們怎樣認識社會呢？可能等到丈夫回來還要給他罵，把工作壓力在家中發洩，以為娶了太太會帶來好運，怎知太太來港反而更麻煩。

如果沒有自由行，他們的婚姻可能會維持長些，現在太太提早來港適應生活，反而要提早離婚，因為他們有問題存在，又不知道向誰求助。他們沒有身份証，社福機構不會接觸他們，不會幫助他們。最近四月十日，在彩雲邨，有位男士跳樓，星島日報記者介紹他的太太來找我，因為他們不知有甚麼可以幫到她，因

為他們知道我們起碼會幫助雙程証媽媽，家庭有問題的婦女我們都會收留，讓同路人可以分享一下，給他們一個透透氣的地方，這才是融入社會的機會，政府應該提供一些服務、活動、機會他們，尤其現在他們五年可以來港，這群婦女都是20幾到30歲，很年輕就到香港，如果政府想他們提早認識香港，應該讓她們學習，讓她們較容易就業，如果他們來港甚麼都不懂，只會去做清潔，去洗碗去做茶餐廳，這些工作並非30歲的人去做的，搶走低工資的飯碗，這是一個政策的問題。

第三種情況，我會講一些隱形的婦女，她們可能每日都在我們身邊經過，每日我們都遇到，但是無人知道的就是她們是雙程証婦女，但是可能她們的丈夫已經過身，或者有些被迫離了婚；但是他本身未取到單程証，也有些是同居關係，在香港誕下孩子，這些小朋友面臨現今新的綜援政策，今年二月份，綜援政策規定，如果小孩子的父母皆不是香港人，又或者他的監護人沒有領取綜援，就不能領取綜援，這是一個陷阱。雖然她們的丈夫過了身，但是他們的婚姻是真實的，她們的丈夫的確是香港人，但是她們自己還未成為香港人，那怎麼辦呢？這方面真的沒有人能幫到她們，因為無人認識她們，無人想知道她們的事。這些雙程証媽媽，之前小朋友有領綜援，幼稚園或學校幫他們寫了信，酌情批准她們來港三個月探親及照顧小朋友，有些住在外省的，每次續期時候就帶個小朋友離開學校，返去續期。有些返去較遠的地方，可能要整個月才能續期，然後才能回港，那小朋友奔奔波波，又缺乏上堂的機會，引致他們的學業成績不好，沒有人理會這些小朋友，社會上又無人關注他們，可能以前會有酌情權的，但是突然間丈夫過了身，令他們有很多問題。我認識一些有這個問題的婦女，他們去找好多人大委員、議員，寫信求情，但是大陸是不會批的，他們會說這段婚姻已經不存在，大陸並沒有這樣的條例去批准他們去香港，在香港這些婦女只是望天打卦沒有將來，有一日過一日，希望孩子快些長大，等孩子夠十八歲，等自

己夠六十歲，才來香港。就是這樣，這一批屬於隱形的婦女，無人去理會、幫忙她們，所以這些中港家庭，面對著跨境婚姻、歧視、家庭、貧窮等一系列的問題。

政府是需要反思的，不應該漠視這群人的需要，特別是婦女的需要，更應該提高道德教育，提升香港男士的意識。政府的政策就是以綜緩政策歧視新移民，標籤新移民就是來港取綜緩的，人口政策就是要分化新移民，亦可以說未來的香港人都是會被分化的，因為現在的移民政策是以吸引高知識的專業人才，標榜香港需要這些人才，不要低質素的窮人，我們將來的香港，全部都要有高學歷才能留港工作，那清潔工作不需要人嗎？為何政府沒有配套服務呢，目的就是不想大陸的婦女來港，那是否應該教育男士們不要返大陸娶妻呢？這些是政府政策的問題，人口政策實在好有問題，政府究竟需要怎樣的人口呢？我認為應該要有檢討，盡快檢討人口政策，希望在座同學及朋友都倡議政府檢討，應該明確的規定人口政策。是否新移民婦女就無貢獻呢？新移民婦女好辛苦來到香港，養育了好多小朋友，填補人口老化的問題，但政府完全漠視她們，把所有問題都推卻在他們身上，令新移民婦女在香港面對各方的困難，但是社會上無人明白，我希望社會上的主流人士能夠多了解新移民婦女的情況，多謝大家。

答問環節



主持：

以下是討論時間，共十五分鐘，各位有任何問題都可以隨便發問。

問：

我想問蔡博士，剛才你提過你的研究範圍，那些關於新來港的問題，可能每個丈夫一定要負一些責任，丈夫都要為他的太太來港生活做一些協助，但是他們好多時發覺他們不能夠協助太太之餘，卻成為她們適應的障礙，其實你有這個發現時，你會有甚麼建議讓前線社工參考呢？

蔡玉萍教授：

提到丈夫的問題，我們要留意這一班新來港婦女的丈夫其實已經被現今香港主流經濟結構或者被政府邊緣化，我們在水圍的訪問當中發現其實很多新來港女士的丈夫自己本身都是由大陸來港，他們很多都是屬於香港的最低下階層，他們過去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衝擊，是受影響最大的那群人。

我想從兩方面去討論你的問題：第一點是前線社工如何可以幫他們；第二點是，我都要再次說明我一直都認為單靠前線社工支援是不足夠的。剛才提到的最低工資、以及提高勞工保障等問題，其實這一群丈夫及他們的新來港太太所面對的經濟環境或者勞工市場的處境不會相差很遠，他們很多時要面對很低的人工，非常長的工時，例如我工作的大廈的保安員，其實他自己是60年代來港，在80年代尾返大陸娶太太，這位保安員告訴我在2003年是三更制的，即是他們每一日工作8小時，但在SARS之後公司改為兩更制，他要7點返工，晚7點放工，但其實他不是朝早7點鐘到達，而要6點半去到工作地點，因為他們的管理階層要訓話，做一些組織工作，夜晚並非7點收工，而是7點半收工，所以其實他們工作13個小時。我認為我們要小心討論這個問題，好多

時丈夫本身並非「衰人」，其實他本身都要面對好多社會低下階層的問題，楊女士剛才都講了很多政策，政策上的改變是根本，但是我們需要明白在香港這個環境下，政策的改變是非常困難的，政府現在想做的是即時見效的政策。此外，如果要政府提供一些資金，多請幾個社工，可能政府是願意的，但是要政府改變政策，他們就會擔心牽涉其他社群，影響商界利益，他們就會不想做。

長遠的話，要改善香港，有一個好重要的訊息，就是讓大家知道新來港的女性及他們的丈夫的處境是獨特的，但其實他們的情況跟其他低下階層非完全不同，其實我剛才提到一個數字是幾有趣的，就是1986年香港的平均收入中位數是一萬一千元，到了2008年收入中位數都是差不多，所以其實香港低下階層處境未必有改善，所以這一群家庭，跟香港低下層的處境其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第二點就是前線社工就如何去支援，令情況有所改善，很重要的就是，前線社工要把新來港女性的丈夫都納入支援網絡裡面，其實他們都需要面對很多適應的問題。我曾訪問過幾位男性，發現一個很有趣的情況，就是在他與太太的互動裡面，他們可能是一個「大男人」，他們本身相當保守，雖然娶了一個中國大陸來的太太，但可能他們都跟香港人一樣對中國大陸人士有偏見，面對這些問題，他們都覺得很無助、很困擾，他們也需要適應，例如太太未到香港的時候，他可能常常有自己的時間，很多問題不需要去面對，現在多了太太和孩子來香港，他的擔子就重了。我覺得一個完整的支援服務應該把將他們都納入支援網裡面，前線工作人員亦不要標籤這一群新來港婦女的丈夫是壞人。我很怕提到新來港婦女的日常問題是來自丈夫，把丈夫標籤為壞人。在我自己的日常生活裡面，都會接觸到新來港婦女的丈夫，其實他們大都是好的，但是他們都要面對生活上的許多轉變。還

有，你們都知道這群男性大部分都是年紀較大的，他們的性別意識較保守，所以我認為支援服務裡面另一個可以討論的就是性別意識的問題，他們說自己年紀大要返大陸娶妻，但是又會質疑太太為何要嫁給他，性別危機很強的，我覺得這點在支援服務裡面可以考慮一下，作為一個切入點。

譚少薇教授：

剛才幾位講者的演講內容十分豐富，而幾位都提到有一點是關於文化的問題。剛才提過好多問題都是物質經濟上的困境，社會網絡的缺乏等等；長遠而言，這些問題是不會消失的，因為香港是開放型的社會，有新的群體進入這個社會是一個必然的事，我們亦都不能只限制一些高質素的移民入境，其實高質素的移民也打拼了很多年。我認為政府如何建立長遠的人口政策是需要討論的，但是在短期來說我們怎樣可以改變到這些問題，我們似乎忽略了一點，就是提到政策和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時，內容是什麼？我們提到丈夫需要被納入幫助網絡中，但其實好多社工都會告訴你很多男人不會到社區中心，你捉他們也不會願意來，如果給予一些誘因，例如嘉年華會等活動，他們可能會來，但其他時間他們根本不會來。其實這顯示服務內容有問題，我自己並無親身做過這類研究，但是我最近有一個碩士學生寫了一篇論文，正正就是關於新移民婦女，他提到一些情況，我相信各位社工不會介意的，就是婦女在社區中心得到一些服務，例如新移民婦女英文班，中心是為他們提供了服務，但是他們學英文時發覺老師總是教他們講港式英文，即是中英夾雜，這樣才似香港人，即是說迫他們學做香港人。其實我們都常常犯這些毛病，但是我們認為這些是香港人優越的地方，所以要他們學，因為他們是新移民，所以要學香港文化。如何去顯示你是香港人、可以獲取香港人的身份？就是要去扮香港人，很重視個「扮」字，明明不是，但是要「扮」成是香港人。通過語言或者行為的模仿，例如衣著不能太老套，否則會被嘲笑為「大陸婆」，於是就不敢抬起頭做人。

其實我認為這顯示社工同工之間都相當重視港人與大陸人之間的分別，其實這並非去幫助，不應該用“幫助”這個詞，也並非融和工作，反而是強化了那個界限：即是，你們是大陸人，我們港人較強，所以你應該來學我們。我常常都在想，這樣不單止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強化了問題，即是不斷去強化這個標籤，我未想到有甚麼即時可以做到的政策，我認為長遠而言應該是教育的問題，我們究竟是否有一個能夠尊重多元性的社會，在政策上是否能夠推動，策略上，新移民婦女是否都可以考慮夥同其他群體去爭取，不單止只為新移民婦女爭取更多，而是怎樣去令到政府真正尊重多元性，而非單一化通過不同的政策去推動，例如只重視有大學學位、有體育天份、有音樂天份的人才可以移居到香港，而是應該看到社會多階層互相協助的重要性、多元化的尊重，才能至可以根本地去解決這個問題。

楊媚女士：

其實我們常常都與很多民間團體一齊合作，特別現今討論的人口政策，我們都去商議，了解政府想要怎樣的人口政策。我們也有與大學學者有一齊開會討論，但是政府好似想避開我們，唐英年也不接見我們，沒法約到時間，那怎樣去多元化合作？至於政府屬下的團體或者中港中心都無關係，怎會理會我們。好似同根社，我們自負盈虧，籌到錢，有瓦遮頭，能報銷車馬費，姊妹們都已經很滿足了，哪還有人會來幫忙，我們都無人理會，更加沒有人敢跟我們合作，我們很難去搵人幫助，只是一些民間團體、一些熱心市民，還有一些熱心社會事務的大學生，以義工形式幫我們，與我們討論問題。我們都很積極參與民間群體，人口政策小組都有我們的資料，我們定期開會，都希望政府給我們一個明確的答覆，他們想要怎樣的人口政策。現在政府不重視這群新移民，但實情是全港有好多新移民，只不過是在不同年代來港，但是現在被標籤的是九十年代來港的那群，特別是在零三年之後存在的問題，這些問題已經是一直存在，但是政府漠視問

題，視而不見。

問：

我是社工，剛才聽到三個層次的討論，首先是好高層次的學術研究，跟著是社會文化的情況，然後是楊女士實實在在的經驗。我不是社署的社工，其實社署可能都很為難，因為政策是上層訂立的。我自己是非牟利機構的社工，在某程度上楊女士都講了實際的情況，真是沒有辦法的，政府的人口政策是要有移民人口，但是它的各方面配套，政府一直都在逃避，在綜緩的政策上，在房屋的政策上，都製造了很多矛盾，我們講的高層次的結構性問題，其實是很難等到它會有轉變，老實說其實是一個死胡同，社工不知怎樣做，新移民婦女來到香港其實有無困難？政策政治環境是否配合？我們都不知道。我想我們今日的討論很好。

楊女士回應：

不好意思，我鬧了你們社工。

發問者回應：

不是，不是，這些討論是很好的，不過政府代表都沒有留下一起討論。

楊女士回應：

剛才尤太演講時我真的想回應她。

發問者回應：

不知道政府會否留意我們今天的討論，然後就這一討論，會有些想法。今日這個工作坊其實很好。

蔡玉萍教授回應：

其實我們請尤太的時候，有一個好強烈的建議是希望在她的

演講後有一個答問環節，但是我想她不想有這個環節。不過這個工作坊完成後，我們出版一本小冊子記錄工作訪的過程，整個討論及對話，我們一定會寄給政府部門，亦希望尤太會看。

第二就是我自己對這幾年的香港社會都相當失望，昨天那麼多人去迎接奧運聖火，但是五一勞動節爭取最低工資卻又那麼少人參加，不過不一定是絕望的，其實有些事是可以做到，我覺得最低工資其實是可以繼續爭取，相信它不會很遙遠，因為現今貧富懸殊太嚴重，對香港的國際形象始終不是太好的形象，其實政府會顧慮到的。當然社會現時的情況是，我們有問題的時候，正如楊女士的講法，第一個被開刀的是最低下階層，其實新來港的女士是其中一個例子，菲籍及印籍傭工都是例子，不知道你們是否記得在2004年政府增加了外傭稅，其實是在她們人工裡扣了400元。現在政府有這麼多盈餘，但是又有幾多人有想過將這稅項還給她們，我覺得在道德上是很難接受的。

問：

多謝多位講者的分享，令我們了解到新移民婦女政策對她們的影響，剛才聽到許多都未必是個人層面的問題，是社會政策結構的問題，我都想問一問現今社會有哪些倡議的工作、行動，其實我們可以參加，從而更了解這一個問題？

楊媚女士：

同根社都很需要義工，特別是你這些有作為的義工，若是關於功課、研究，都好歡迎你們問我。

九龍婦女聯會代表：

好多謝這個工作坊讓大家探討女性新移民的問題，其實我很認同譚少薇教授的想法，其實在新移民婦女的問題上，香港社會的確要尊重多元化及共融。其實所有新移民在角色上如何融入

社會，其實我覺得應該是互動的，這是雙向，不是單向的。我們九龍婦女聯會，在社區為本的服務當中亦是十分關注新移民的服務，好似在深水埗區我們有一個中心是專門為新移民服務的，因為該區有比較多新移民，我們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幼兒暫托服務及功課輔導服務，而在比較多新移民聚居的寶達邨裡，我們亦曾經開展過一些「和諧家庭、和諧市區」的活動。

另外，我們發現老夫少妻並不是一定不可以相處，在去年慶祝回歸活動有個家庭評選的活動，我們寶達邨有對夫婦，是老夫少妻的家庭，他們就相處得非常好。其實我覺得社會對新移民一定不可以有標籤，歧視他們，更加需要的就是我們主流社會如何正面地對待這些新移民家庭，如何從不同角度去充份調動社會各界的力量，提供正面的支持活動及服務。其實我不否認政府有些政策會顧及以上提到的問題，但或者是未能夠改善，我認為在社會發展的過程當中這些問題，是需要我們各方齊心協定去解決的，多謝。

問：

你好，我是負責新來港人士服務的社工，在04年未入行之前我從事社區健康教育服務方面的工作，當我們中心新來港服務成立了多年之後，在04年中我們發現政府的新來港人士服務中心已停辦，把服務撥入了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那時有很大迴響，甚至社聯都開過很多工作坊、研討會去探討。我自己本身是土生土長香港人，在未做新來港服務之前，其實我對新來港人士都有歧視。但為何我會有個新的觀感？原來你不去接觸、不去了解，你會覺得這班人跟我們有很大分別，之前在街上很容易就分出哪些是本港人，哪些是國內人士，因為大家的衣著、舉止言行都有分別；但當我接觸他們之後，了解多了，明白他們的背景、文化，便會多了體諒。我發覺原來社會上，甚至我們做社工的，甚至政府的官員，不從一些負面的角度去分析，社會會多些和諧、多些接納。

今日我都有好大衝擊，沒有政府官員在此參與討論，如果尤太留在這裡，我想她不是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做些甚麼，她只會知道她要告訴我們應該點做一些促進和諧的東西，而我們一般市民就不要做一些歧視及標籤的行為，那就不會反映到問題所在，我認為歧視的原因，很多時在傳媒，如電台、報章，不好意思，我提到一些關於傳媒的東西，甚至可能是政府社會福利署很多時都提及一些負面的新聞，例如新移民來港只懂領綜援，而不去真正探討背後他們真正的需要，換言之，做一些社會教育、公眾教育，對我們本身整個香港社會某些人不是邊緣化，甚至是標籤為一些不好的東西，甚至是將他們看成為新移民再加貧窮問題。其實香港並非所有人都有錢，整個香港都有不同的人的存在，但是我們如何去做到和諧？我入職做新來港人士服務之後，明白婦女為何找社工才肯講，而不是在朋輩之間。我常常告訴別人，原來我們的價值也十分重要，因我去理解她們的時候，我明白如何用一些方法去幫助她們。

這個工作坊透過大家不同層面的分享，例如學者、同根社成員之間的討論，我更明白問題背後不同的層次，我們如何可以多做一點，不知可否透過今次討論，在同行裡多發放這些消息，使大家在前線上可以多做工作，令到這個社會有些人士不會被邊緣化，不會被人歧視。

當然有時問題不是出於一個婦女身上這麼簡單，可能是她丈夫出現了許多問題、又可能是丈夫的媽媽迫他結婚，而去娶內地婦女，而不是女人本身的問題，是整個家庭的問題及社會的問題。這些是我突然想起的社會現象，新移民不單包括婦女、丈夫這麼簡單，其實是影響整個家庭、整個地區、甚至整個社會政策上，我覺得我們如果真的團結一致，對於其他新來港的政策都能做一些回應的時候，那個時候，我們就可以連結不同機構的力量，一同去發揮，就新來港的服務，不單只有我們機構在做，有

許多機構正在熱心地做，由低層、少部份開始去做，他們會發掘到一些問題，結合大家的力量，我們就可以在不同階段反映給政府部門，讓他們知道有這些事情。

陳惜姿女士：

提到媒介，屬於我的本行，我自己作為媒介的一份子，看這些事是非常敏感的，我們會留意媒介如何反映這些社會福利及社會問題。我們這本書出版之後都會有天水圍的中產階級批評我們，為何要把天水圍寫成這麼差，雖然我們講天水圍女人努力的一面，但是他們仍然覺得「你覺得我們需要努力，就是說我們有問題，所以才要去努力」。如果要講媒介表達的情況，這會是另外一個工作坊的討論，現在我不能詳細解釋。

政府很多時如果要削減(cut)福利，先會在傳媒「放風」，例如剛才楊女士提到政府2月改變的政策：父母都不是香港人，他們的小朋友雖然在香港出生也不可領綜援。我很清楚記得那日之前報紙曾發放消息，是關於幾個騙綜援的個案，之後便為政策改變鋪了一條路「政府停止這個綜援是順理成章，不能濫用這樣東西(綜援)」。即是它每次都選擇一張或幾份信得過的報紙去報導，然後跟著去改變就能名正言順，因為香港人個個都是白手興家，覺得是靠自己打拼出來的，新移民如何可以一來港就要領綜援，我們當年也沒領過。這其實傷害性很大的，令到政府改變了政策之後，大家都覺得很正常。但媒介其實是否可以不要這麼“food-feed”，即人家餵你食你便張開口。其實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去講，或者我們要敏感一點，知道社署又來放消息了，故事全香港只有你獨家報導，但是否一定要這樣敘述這故事，還是我們要做甚麼專輯去做得全面一點，這個要講傳媒的良心及其意識。

蔡玉萍教授：

我想回應最後兩點，第一個是我今日學到的首先是個正名的

問題，我想等一下可以討論新移民這個名字其實是否含有太多標籤，其實是否用「新來港人士」會好一點。我發覺其實正名也是十分重要，例如講性工作者，如果有新的名稱，其實對群體也十分重要，我想我們稍後可以討論「新來港人士」這個名字是否會好一點。

第二樣我想很簡短回應公眾教育的論點，本來我們的公民教育是可以做到反映社會的多元性，可以講一些社會融和、文化層面如香港身份的反省等，但不知道大家有否留意近年的公民教育已變成民族教育、愛國教育，反而公民責任、與其他社會界別的融和等，在公民教育已經被邊緣化。我最近很不開心，我不是不支持奧運，但是我覺得很多談論，很少討論。我們現在的公民教育不是著重如何做一個負責任的公民，而是愛國教育。這些是一些十分重要的社會議題，我們要改變年青人的公開的討論空間(Forum)其實已經沒有了，至於傳媒的問題，剛才陳惜姿已講過了。

分組討論

1. 新移民婦女與工作就業

找工作的過程或困難

- ★ 在找工作的過程中，新移民婦女有什麼資訊來源？報紙？仲介？親戚？朋友？
- ★ 找工作的時候是否考慮到通勤的問題和費用？是否因此影響到找工作的地點位置？
- ★ 是否顧及到照顧家庭和子女的問題？是否會為了有更多時間照顧家庭而放棄條件相對好的工作？
- ★ 對這樣的考慮，家人理解嗎？

工作上遇到的問題

- ★ 她們工作時最常遇到什麼問題？
- ★ 遇到問題時向誰尋求幫助？
- ★ 是否有被歧視？比如性別歧視？語言歧視？
- ★ 是否經常轉工？

2. 新移民婦女與社會參與

社會網絡

- ★ 除了家人外，她們業餘時間會與什麼人交往？
- ★ 她們有自己的社交圈子嗎？多久聚一次？
- ★ 與內地的親屬、同學、朋友還有聯繫嗎？
- ★ 在本港是否有同事？下班後是否還會與同事有聯繫？

獲得資訊的途徑

- ★ 她們經常看報紙嗎？電視呢？會否上網？
- ★ 會與家人、孩子談起外面的事情嗎？

- ★ 平日裏有關物價、時局、市面的消息是從什麼渠道獲得的？

政府提供的幫助

- ★ 有困難時是否會考慮到與政府聯繫？會尋求什麼幫助？
- ★ 如果有這樣的經歷，她們的感覺如何？會推薦有關服務給朋友和相同經歷的人們嗎？

3. 新移民婦女與社會觀點及認同

語言問題

- ★ 剛來香港的時候懂粵語嗎？
- ★ 用了多少時間去克服語言問題的？
- ★ 是否因為語言被歧視過？可以描述一下經歷嗎？
- ★ 孩子學習英文的時候怎樣給予幫助？

對香港的看法

- ★ 她們對香港的哪些地方最滿意？最不满意？
- ★ 跟家鄉比較香港有哪些不同？

身分認同

- ★ 經常回內地嗎？
- ★ 想過搬回內地嗎？
- ★ 對香港的生活習慣嗎？
- ★ 她們認為哪些香港人對內地的理解是正確的？不正確的？

歧視經驗

- ★ 會否因為內地新移民的身分而受到歧視？
- ★ 可否具體談一下被歧視的經過？你認識的新移民婦女有否此經歷？

- ★ 受到歧視後怎麼辦？

4. 新移民婦女與家庭/子女教育

與配偶，家人相處

- ★ 社區成員因為家庭矛盾而向婦女組織和社會組織需求幫助的，會因為何種矛盾尋求幫助？各類組織會提供甚麼幫助和服務？
- ★ 是否會覺得這是別人的家事，應該尊重隱私，少參與？
- ★ 是否會覺得家庭主婦在家中理應忍讓為先，盡孝道，盡為人婦、為人母的職責，因此應該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 ★ 是否認為這些問題是因為新移民缺乏對香港的瞭解，所以時間長了矛盾自然就會消失？

居住環境

- ★ 在每個社區都會有不同的、自然形成的網絡，不同身份的居民會有自己的社區網絡。區內的政府組織和社區組織瞭解這樣的網絡嗎？是否想過也許這樣自然形成的社會圈子也許更有效，更可以解決社區內的矛盾？

對子女的期望

- ★ 當子女同父母，尤其是新來港的母親發生衝突時，社區組織會如何幫助？是否會覺得新移民父母不瞭解香港情況？或者是因為孩子不孝順？
- ★ 如果社區內父母都因為工作繁忙而忽視了同子女的交流與互動，社區組織會提供什麼幫助？
- ★ 對於單親父母，社區組織又會提供什麼樣的服務和幫助？是否會覺得這些都是各家自己的情況，社區組織沒必要、沒能力、也沒有財力去提供具體幫助？

分組討論報告



主持：

首先，做五分鐘的簡短報告，很抱歉當時間一到我就會停止你的報告。以下的時間，如果大家不介意，可否請由坐在最遠的朋友先開始，謝謝。

小組代表一：

好，謝謝。

其實我的小組剛才花最多時間在一個有些弔詭的話題上：其實我們近年來不論社工界，又或是學院界都有提到一些不足、負面的情況……但我們想到其實我們可以從另一角度，找一些成功的例子，甚麼是「成功」或者要另作討論，我們應該說是比較容易過渡、適應新生活的朋友，從中找出一些可以幫助她們適應得比較好的因素。但在這些因素中，要小心留意是否屬個人因素，如屬個人因素，也許政府會表示感謝，因為這表示了是新移民自己的不足造成他們的問題。

但我們比較看重一些客觀的因素：例如，是否因為一些環境上或是社群上的因素令到她們更好地適應。如我們剛才的舉例：以前有些「鄉親會」的夥伴支持(peer support)是很強的；又有一些外國例子，如華人去到唐人街，那兒有很多不同的團體，那兒的情況可能跟香港相反，可能社工的幫助不及那些團體。可能那些團體能更有效地幫助她們，多於建制上的東西，某程度上福利界，社工……都是十分建制的。譬如說，記得小時候，怎樣的學生才需要見社工？那是有問題的學生。何時見過一些很乖巧的小朋友去見社工呢？我想，這個普遍現象很容易使人配上了一個標籤(label)。其實社工都是這樣想，好端端的為甚麼要見社工呢？在沙士(SARS)發生的時候，我在中心做「中年地區就業培訓」，那些婦女都說她們不想被僱主知道她們被社工跟進，她們都聽說過被社工跟進的人都是「有問題」的，所以我們就要多想一些，怎樣利用建制以外的一些有利的因素，去幫助她們適應。

另外，剛才有朋友說到「公民教育」方面，除了愛國教育，可以更加強調家庭裏面的角色，包括兒子、女兒。剛才都有一些地方說到：做丈夫的，會不會做好丈夫？做兒女的，在家庭當中能擔任甚麼角色，可以宣傳(promote)多些，令觀點可以平衡一點。

傳媒的力量也很大，例如我們常看到一個政府廣告說「都是一家人嘛」。我想其實傳媒的影響可以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有時候傳媒報導有關新來港婦女的一些負面新聞，這些報導可能成為政府動議修改政策的部分依據。另一方面，傳媒也報導新來港婦女的正面新聞，可以起到平衡作用。以上是我們的討論內容，或者組員有沒有一些補充？謝謝。

主持：

時間掌握得非常好，十分感謝。請下一位發表，謝謝。

小組代表二：

大家好，我們是第四組的。我們組員中有同根社的婦女，也有社工、教師。我們聽過兩位同根社婦女的分享，讓我作一個小小的總結：我聽她們提起接觸社工的經驗，但是那些都不是愉快的經驗。我自己身為社工，聽過後我作出一些反思。聽她們說：當婦女跟社工傾談的時候，都看到問題主要不是婦女的文化差異，以致來到香港不適應，而是反過來，連我們社工都不清楚國內婦女的情況。可能她們在跟我們傾談的時候，我們未必知道她們有甚麼需要。她們的經歷跟我們的九年免費教育是不一樣的，新來港的婦女有大部份像剛才都提到一樣，都是「電腦盲」、「英語盲」。這些問題可能她們不敢說，這令我們未必知道她們的需要。這提醒了我們，當我們幫她們去適應香港社會的同時，特別當我們去前線工作的時候，我們是否需要了解多一些國內的情況呢？剛才跟她們傾談的時候，我們發現原來我們的了解還不

足夠。有一位婦女提到，當她遇到家庭問題，例如婆媳糾紛的情況，即是奶奶說的話不合聽，以致情緒低落，而去尋求協助的時候，社工很快就說：「離婚吧。」似乎很快地解決了這件事，不會耐心聽她說話。這麼快就到了離婚這一步，又經常叫她們回國內，因為她們在香港生活得不開心，不如回到國內。其實剛才婦女提醒了一點，原本我是不知道的，原來國內婦女嫁到香港，她們沒有回頭路，為甚麼呢？她們已經沒有戶口，沒有田地。當兒女回到內地去讀書，就要交不同的學費。即是說婦女來到香港就真的不能再返回內地生活，這個情況其實我是不太清楚的，很抱歉。

我們都聽到婦女的心聲，我想代表社工說，其實不是所有社工都是這樣的，絕對不會是這樣，但是正如剛才另外一組都提過，是礙於一些建制上的情況可能限制了社工，可能該社工在一個月內要負責的個案超過一百個。你們都計算到，該社工平均每天要處理多少個個案呢？他可以花多少時間去處理？社工自己都要把個案排次序，優先處理死人塌樓的個案，不然就後果嚴重，甚至會上報紙。連社工都面對這些工作上的壓力，其實剛才的婦女都明白，都知道的，但是我覺得自己作為社工，應該想想是否因為這樣，就要把我們在學院學到的，把我們社工的精神、價值放下。

剛才都有組員提到過，其實在整個新移民家庭，受害者可能是小朋友，因為小朋友跟婦女一樣都是「連根拔起」，他們在國內的家居可能大一些，到了香港生活不同了，教育制度又不一樣，他們都適應得很辛苦。有教師分享說，其實他們知道這些問題，也會嘗試多了解小朋友，多提供一些幫助，其實教師和社工一樣也有他們的難處，例如老師要面對教育制度的改革，因此可能沒法每一天都多花時間去照顧每一個學生的個別需要。

最後我們組內都提過少量建議，希望強化社會網絡，因為

始終都是那一句「遠親不如近鄰」，以前可以請鄰居幫忙看顧小朋友。這些網絡可能在一些突發事件中能使婦女找到鄰居幫忙，但是到了香港，情況已經不是這樣，可能婦女連鄰居的姓氏都未必知道。我們都會想，如果鄰居的互助網絡做得好一些，請他們照顧小朋友一、兩小時其實都不是甚麼大問題，不用獨留兒童在家。我們亦提到，其實婦女如果限制在一些社區內生活，我們是否應該舉辦一些活動，令她們可以抽離一下，不用整天都困在一個社區，用活動去令她們輕鬆一點。我們社工其實都需要一些反省，因為我們都存在一些偏見，是需要改正的，需要認識多些才向前線進發。謝謝大家。

主持：

十分感謝。請下一組發表。

小組代表三：

大家好，我們的題目是關於「新移民婦女與社會參與」，我們的組員來自各個方面，有明愛的社工，有同根社的代表，有新移民婦女。我們用了大部份的時間去討論其實新移民婦女她們都很想融入香港社會，譬如說，她們很想參加一些英語學習班、廣東話班，但是都沒有機會參加，因為她們領取雙程證來港的時候，她們都未有身份證，所以她們都不合資格去參加這些學習班。那兒有些課程可以以非會員價去參加，當她們以非會員價參加，她們就要面對金錢上的問題。另外有婦女提議：可否以家庭單位去報名參加這些課程。例如丈夫是持有香港身份證，可以使用家庭單位去讓這些婦女參加一些課程，讓她們更容易融入香港。

如剛才講者所說，婦女們本身沒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很多時都只是與一些小朋友的家長溝通、交往，這些家長都是新移民的婦女，她們很少與香港小朋友的家長交往。另外，因為我們

組裏有明愛的社工，我們知道其實香港都會主動提供一些服務予這些新移民婦女，原來這些婦女入境的時候，明愛的工作人員都會留下她們的電話號碼，以後會主動聯絡她們，詢問她們有甚麼需要，關心她們。

社工其實可以幫助她們甚麼呢？例如有輔導員去輔導她們，以及帶她們去認識社區：例如唱卡拉OK，或者去討論哪兒購物會便宜些，社工可以提供以上服務予她們。最後我們都提過，新移民婦女其實不是一個負擔，她們都會帶來一些技術，例如普通話、烹飪技術，其實她們可以去開班教烹飪，但這也會存在一個問題就是不知道這行動是否合法，因為她們連參加培訓都不可以，根本都沒有一個身份去接受工資，所以不知道她們可否開班教學。

主持：

好的，十分感謝。下一位。

小組代表四：

大家好，我們組別的主題是「新移民婦女與工作及就業」。討論這個題目的時候，我們都嘗試將這個題目放在一個階級的框架去看：因為我們看過一些數據，知道一些新來港家庭處於低收入狀態，於是我們先將這個問題放在一個「她們普遍都面對經濟的壓力」的框架去看。在我們的組別中，提到很多的新來港婦女都有很強的工作意欲，這個情況跟主流媒體所建構的所謂「懶惰」，即不想工作的形象，是有所出入的。這可能包含了幾樣要素，包括她們本身可能正受到經濟壓力，她們要出來做兼職去幫補家計。亦可能是她們都希望生活可以得到改善，但是都有一個常見的現象是她們都面對一個「向下流動」的現象，向下流動是指她們以前在國內有一個不錯的職位，有不錯的收入，但這些資歷在香港不被承認，所以她們要做一些基層的，低工資的工作。

我們發現她們其實在勞動市場處於一個較邊緣的位置，有些人會用「邊緣勞工」來形容她們的狀態，包括工資相對較低、工時長、議價能力較低。這個狀況可能與整體香港勞動市場的狀況類似，香港的勞動保障、勞工保障都非常之「有名」的——因為香港基本上沒有完善的勞工保障，所以婦女被剝削的機會相當大。同時政府有政策支援婦女就業，或者叫作推動，或強逼她們就業。包括綜援，當中有一些強制性的就業要求，當然這個強制性就業要求比較明顯地不認同婦女在家照顧小朋友，照顧家庭這些無償勞動的工作，他們覺得參與社會就一定要參與一些有薪工作。在這個層面上，新來港婦女所面對的壓力可能更加大，因為如果她們要酌情權，要領取綜援，都需要有「參與有薪工作」這項條件。

另外有些同工都提及一些社會企業，尤太都有提及現在政府嘗試用社會企業去創造一些就業機會，讓婦女可以容易配合到工作時間。在座的人都同意這一種方向，認同這個目標，不過實行出來的效果可能並不理想。這包括了資金、基金的計劃要求，那個「社區投資共享基金」亦給予社工們很大壓力。婦女們都講過，工時很長，加上托兒服務不足夠，大家都很悲觀，工作時間很長，到晚上十時、十一時才下班，服務機構都很難幫助，就算延長了服務時間，可能只延長到八、九時，很難再延長到十一時這麼晚。如果我們香港的工作時間都是這麼誇張，這個問題都會不容易從服務層面去解決。雖然我們看到勞動市場的環境及社會政策方面，都不是有利於低收入家庭，亦不是家庭友善。討論中亦提及過一點，原來現在的制度當中，「平等機會」機制不涵蓋新來港人士，因為平等機會委員會必需依據那三條法例，而那三條法例分別是性別、種族及家庭崗位，是不包括新移民，在將來亦不打算加入。如果她們面對一些比較明顯的歧視的時候，都是投訴無門的。所以這亦都是一個比較惡劣的環境。簡單地說，可能大家都覺得近這兩年來，經濟表面上好轉，市面應該有更多的

就業機會，但是就業機會增加並不等於這些低收入的新來港家庭可以脫離貧窮。而政府亦不想在制度上承認家務勞動，如果長遠來說要解決新來港家庭的收入、貧窮的問題，不能單靠社會服務。當然社會服務能夠提供一些融入社會的機會或者令她們增強自信心、自我認同感，但是，必需要配合整個制度的改善。

最後一點，我想回應之前討論的融入社會的服務，我記得剛才譚教授講過，我們的融入服務其實是香港本位主義的一個角度，即我們教婦女唱卡拉OK或購物。我不是批評這些服務，這些服務絕對有其作用。不過可能同時我們是教導一些所謂香港的價值，或者是香港的文化，這些體現了香港主流社會對新來港婦女的期望。但是實際上我們抹煞了或是我們看不到她們自己本身的文化，可能我們社工都需要自己反省，從而可以接納到這些文化差異。我想這點是我今天需要反思的地方，謝謝。

主持：

十分感謝，時間尚餘很少，我們盡量在十五分鐘內完成，現在還剩下三分鐘，有沒有任何的問題想發問，或者交流的？可能值得討論的，在剛才已經討論過，或者以後我們再把握時間去討論，所以容我做一、兩句簡單的總結。

今天最主要令我獲益良多的，就是有三點特別是令大家比較關心的。第一點是「標籤」，即「命名」的問題。最是弔詭的就是沒有一個「名字」，就難以提出我們的訴求。但究竟怎樣去運用，怎樣去講的時候，可能牽涉到一個很重要的策略性問題，不是討論「新移民」就必定歧視她們。不過究竟在運用的時候我們背負着一個怎麼樣的眼光，其實為甚麼去運用，怎樣去運用是值得我們深思和反省的。而最慘的是在座的我們需要用語言去溝通，往往都需要因利乘便而忘記了語言本身的限制。

第二方面是「政策」及「文化」兩方面之間的互動及合作，這個問題更是淒涼，因為這牽涉到人民素質的問題，亦牽涉到今天最能彰顯到的高官素質的問題，那我們只能盡量去做。

而第三點就是「多元的文化」，怎樣去尊重，而不是單純要她們去融入主流，去適應香港。而同工亦為我們帶來了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怎樣去互相尊重，更重要的是「多元」，怎樣不只停留在「語言」上，而是離開這房間之後可以實踐，推而廣之，帶動我們在言語行為上都能夠做到。

非常多謝今天大家願意抽出星期六寶貴的時間出席，希望我們能有機會再在中大再見。最後，如果大家想要今天的工作坊的討論內容，請留下你們的地址，我們會寄給你，如果你已經留下了聯絡資料，那我們隨後會寄回給你。與此同時，我們亦有少量紀念品給大家，就是我們以前工作坊的小冊子，歡迎大家取閱，多謝。

二零零八年兩性角色工作坊

新移民婦女全面觀

籌備委員會

王丹凝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人類學系 講師
張妙清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性別研究中心 主任
陳澤蕾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講師
樓璋群教授	香港大學	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助理教授
蔡玉萍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社會學系 副教授
盧家詠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性別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

性別研究中心

主任：	張妙清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心理學系 教授及系主任
副主任：	葉漢明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歷史學系 教授
研究助理：	盧家詠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利黃瑤璧樓五樓

香港亞太研究所 性別研究中心

電話：(852)2609-8775

傳真：(852)2603-5215

電郵：grcentre@cuhk.edu.hk

